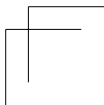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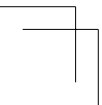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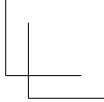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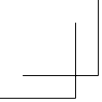




第一部分

难忘的年少岁月

(1935—1960 年, 25 岁以前)



一、我的父母与兄弟姐妹

1. 为民所用

我父母生有三男一女，兄妹四人我排老二。上有哥哥成为，下有妹妹成源与弟弟成用，三兄弟的名字连在一起，即“成为、成民、成用”，体现了父母的人生追求与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全家福（前排自左妈妈、小弟、爸爸，后排自左我、哥哥、妹妹），摄于1955年欢送我去苏联留学前夕

不为官、不经商，不争名、不图利，只求“成为对人民有用”之人。

因此，父母从小对我们教育很严。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流离逃亡中度过的，小学六年上了十一个学校，几乎没有一个学期能在同一个地点学完整。这里学两天那里学两天，常常随着难民人流，听着背后的枪声、顶着飞机的轰炸，日行几十里地，被日寇追得四处逃亡流浪。就在这种食宿无着、十分艰难的日子里，妈妈的包袱里总背着一块石板、几支石笔与几支蜡烛。每天逃难、流亡到目的地安置下来后天色已晚，妈妈在临睡前总要点上蜡烛，推醒睡眠蒙眬的我拿出石板教识几个字。



一岁半的我被妈妈抱在怀里，右侧是爸爸，前面是哥哥

后来，我以近百人取一名的录取率考入北京四中，班主任以为我曾就读于某名校、从师于某名师。

班主任问：“你小学是在哪里学的？谁是你的启蒙老师？”

我答：“我是靠一块石板学习的，我妈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1950年初父亲因抢修被国民党军队撤退时严重破坏的粤汉铁路有功，荣获铁路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并从粤汉铁路管理局上调到刚成立的铁道部，我也随家从湖南衡阳来到北京，在西单北缸瓦市小酱坊胡同6号的三间破旧南厢房住下。

过去我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中小城市，每个城市只有几所中学。到达北京后，第一件使我惊奇不已的事是北京竟有两百多所中学。托人四处打听，得知最好的中学是男四中、师大一附中、师大女附中。

一贯教子极严的母亲把我们兄妹三人（当时弟弟仅一岁）召集在一起说：“都上私立学校我们供不起，在这三所学校中你们每人各选一所去考，试一下自己的实力。谁考得上就有学可上，否则……”

几个月拼命地刻苦攻读，经过多次挫折，最终哥哥考上师大一附中，我考上男四中，妹妹考上师大女附中。三兄妹分别攻下了北京市三个顶尖名校，多年来一直是父母的亲戚、朋友中广泛流传的佳话。父亲的单位还

为此张贴了红榜：恭喜我单位汪良圃工程师三个子女以优异成绩分别考入师大一附中、男四中、师大女附中……

这是继 1948 年在湖南衡阳我们兄妹三人同时包揽全市学生演讲比赛高、中、低年级三个组的第一名，轰动粤汉铁路管理局以后，又一个让父母引以为豪、津津乐道了一辈子的话题。他们更高兴的是这两次事件证明了家庭教育成功，为实现把孩子们个个培养“成为对人民有用”人才的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当时我们的住地缸瓦市小酱坊胡同，距离三个学校都不近，最远的是位于和平门的师大一附中，要步行一个半小时，最近的师大女附中也要步行四十分钟。可是谁都不愿为了就近上学而放弃竭尽全力才考取的尖子学校，更舍不得花几分钱搭有轨电车。每天凌晨四点多被闹钟叫醒，睡眼惺忪的我们背着书包，打着小纸灯笼（当时北京街道上的路灯很少），跌跌撞撞地上了路。

天天如此，风雨无阻。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保留着早起工作的习惯。

多年以来，我们兄妹一直牢记父母的谆谆教导，在学校都是好学生，工作后都是好干部，远离名利场，成了学者、教授，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历史的机遇提供了施展本事的广阔空间，造就了许多人才。今天，我将自己一些“为民所用”的点滴事迹记录在案，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回顾这一生，我可以堂堂正正地说：“我们无愧于这时代、无愧于自己的名字。”为什么一个出生在上海底层的贫穷小职员竟有如此成功的教育经验、如此明确的培养目标与深远的战略眼光？这与我父母的家境与经历是分不开的。

2. 我的父亲

父亲叫汪良圃，生于 1910 年 7 月 31 日，卒于 1995 年 11 月 26 日，是个把一辈子心血奉献给交通建设的老工程师。



爸爸在工作

我的父亲对我们来说是个谜，从小到大每年见不到他几次面。儿时的印象是每隔几个月，他风尘仆仆、满脸倦意地背一个装满脏衣服的背包进门，对妈妈说：“有几天时间在家休息，你把这些衣服给我洗出来，破损的地方修补一下。”

在这几天里我们兄妹必须十分小心谨慎，不喧哗、不打闹，随时准备父亲用严厉、挑剔的眼光来检查我们的功课。孩子们对这个严肃、陌生的父亲都有几分惧怕。

后来稍大些才知道，父亲是铁路系统的劳动模范，他经验丰富、认真负责、吃苦耐劳，凡是最艰苦、最危险的线路经常由他带领一支队伍，跋山涉水打前哨去选线。他的工作就是把纸上的计划变成最科学、最经济、最合理的具体设计、施工方案。长期的职业习惯，使得他对每个细节都斤斤计较，不容忍任何的铺张浪费，他一生为国家节约了不计其数的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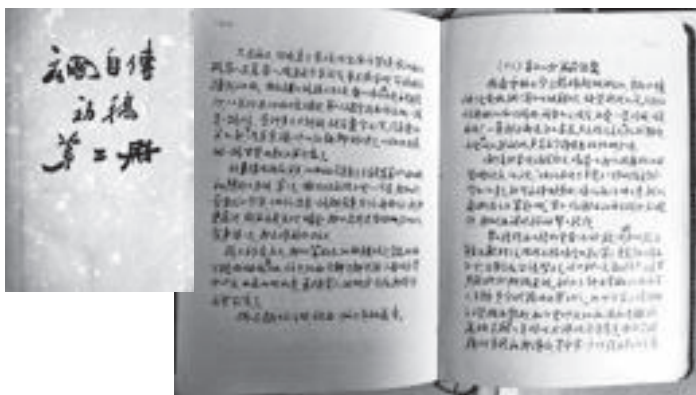
爸爸的工作笔记本，一生承担过的工程全部都有如此记录



爸爸多次荣获铁道部的“先进个人”“劳动模范”称号

但父亲给我们的印象仍是严肃、严厉、认真甚至苛刻。一直到退休后我们同住在一起十几年才体会到在父亲严厉的外表后面是一颗十分温暖的心，他对已要求极其严格、对人细心体贴关怀备至，为子女以及第三代真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父亲晚年喜欢回忆往事，写了不少回忆材料。从中我才知道父亲是住在上海的宁波（奉化）人，是蒋介石的同乡。在他出生前我爷爷、奶奶已定居上海，住在外白渡桥附近的华记路。



爸爸的坎坷一生的回忆录

爷爷是个贫穷的老学究，以教私塾为生，由于人长得体面，又写得一手好字，附近邻居都愿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学习，家庭收入还算过得去。当时，年幼的父亲也跟着这些大哥哥一起读四书五经，“之乎者也”。擅长书法的爷爷亲自为父亲开笔，因此，父亲的毛笔字很见功底。但好景不长，落后于时代的私塾很快被淘汰了，不几年学生逐渐减少，最后私塾只剩下一个学生，他就是我父亲。

私塾关了门靠什么生活？父亲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在生活水准很高的上海，养活六口之家，谈何容易！

这时，我奶奶挺身而出，她在宁波乡下是远近闻名的，心灵手巧，纺纱织布、养蚕缫丝、绣花刺字无所不精，尤其擅长剪刀工。奉化是出裁缝

的地方，当时上海高级成衣铺几乎清一色都是奉化人开的。任何复杂的服装样式，我奶奶只要看一眼仅凭一把剪刀无须划线、打样就敢直接裁剪，一蹴而就，在宁波同乡会里名声很响，上门求教女红的慕名者络绎不绝。奶奶决定利用爷爷原来办私塾的房屋开个洗衣店，先接些附近居民的缝补浆洗衣服的活计，后来发展到专门给外国人的高级服装盘花绣字，生意越来越好。就这样，奶奶靠一枚针养活了全家六口人，不但能吃饱穿暖，还能供孩子上学了。

父亲小学是在上海的宁波同乡会所属甬二校上的，中学在澄衷中学上的，这两个学校的校长都是一个叫童志孚的老先生。因膝下无嗣，童先生多年来一直想在学生中物色一个品学兼优、性格温和、老实可靠的孩子做继子，上海人叫过房儿子。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父亲。

过房的条件是不改姓、不更名，但要求平日照顾好二老，过房爹娘老后负责养老送终。

童校长是个办教育的德高望重的绅士，在宁波同乡中口碑极佳。自父亲过房给他后，全家经济状况大有改善。从此父亲不但吃住在童家，人生重要的事情，如上大学、找工作、结婚、生子都是童家一手操办的。

父母一再叮嘱我们：“过房爹娘对我们比对亲生子女还要好。世代代一定要记住，他们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但是面对这位恩人，父亲却无法实现平日照顾和养老送终的承诺。开始是因为抗日战争，天各一方无法联系；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双方都是旧政府的留用人员，每次运动都受到冲击而不敢联系。

父亲临死前曾深感愧疚地对我说：“我一辈子没做过一件亏心事，唯一就是对不起过房爹娘，我有何面目去见他们？！”

父亲中学时期不仅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更是忧国忧民、热血正直的爱国青年。1926—1927年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以及随后的五卅惨案都发生在我家居住地附近。对当时年仅十几岁的父亲影响很大，他积极参加迎接北伐军、抵制日货等活动，甚至一度放弃学业，热心地组织工人识字班、扫

盲夜校。1932年日寇突然进攻上海闸北，制造“一·二八”事变，父亲日以继夜地上街筹款，并冒着生命危险上火线支援十九路军。

父亲积极参加爱国活动的行为被正在学生中物色党员（国民党）的支部发现并很快集体入了党。当时在国民党内“宁波帮”很得势，尤其蒋介石的同乡奉化人经常可以一步登天，父亲加入国民党后，奉化老乡范景孝（蒋介石的侍卫官）等多次动员他投笔从戎，保证其前途无量。但父亲不但没接受高官厚禄的诱惑，反而于1935年正式宣布脱离国民党。

从此，他离开上海隐姓埋名，一心一意用所学的技术为人民办实事，并决心世代代不做官、不经商、不贪图名利，只求做个对人民有用之人。这段时间恰逢我们兄妹相继出生，父亲的思想在我们名字上体现出来就不奇怪了。

为什么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不但不受高官厚禄的诱惑，反而选择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退党（国民党）举动？

除了耳闻目睹国民党内部腐化堕落、尔虞我诈的种种劣迹外，主要有两个导火线：

一是当时引导父亲参加革命活动的带路人是他的堂哥汪孝达。他是留日归国的共产党员，也是奉化人，曾几次受蒋介石的接见，并得到蒋的高度评价，蒋曾答应委以重任。父亲、母亲对他特别信任、尊崇。

1934年的一个深夜，他突然闯到我们家希望在这里躲避一阵，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父母把他藏匿在我家阁楼的那些天里，他天天与父母促膝长谈。原来当蒋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不可能成为自己亲信后，立即撕掉了亲友、老乡的面具，改变了将委以重用的许诺，亲自下了通缉令并指示：“这个能干的青年若不能为我所用，也决不能让共产党所用。”

二是当时被上海人视为抗日英雄的十九路军，父亲曾为他们捐物筹款，父亲还穿过火线亲自将善款及物资送到前线慰劳十九路军。两年后这支抗日英雄部队，竟被蒋介石调往福建作为围剿苏区的主力。

这两件事使父母彻底认清了国民党不顾国家存亡、人民死活，只谋自

己私利的反动、丑恶本质。

父亲在童家的资助下毕业于大同大学建筑系测量专业，先后供职于浙江省公路局、江西省公路局、粤汉铁路局、铁道部工程建设局等，从技术员一直干到主任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技术能手”。但由于上述历史问题每次运动都受到冲击，多次接受审查。当然最严重的要数“文化大革命”了。

1966年8月23日我们家第一次被抄家，这日期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住在附近（丰富胡同）的著名作家老舍也是在同一天被抄家（老舍被抄家后离家出走，疑于24日凌晨投太平湖而死），而母亲与老舍相识。一批灯市口中学的红卫兵把正卧病在床的母亲一把揪到墙角，翻箱倒柜、破门砸窗，他们要批斗父亲，要母亲检举父亲是国民党潜伏特务。但街道无权揪斗铁道部的干部，父亲照旧天天正常上下班，甚至9月5日接受抢修三线战备铁路的紧急任务到云贵高原长期出差去了。

临别前父母谈话到深夜，这一对相濡以沫35年的夫妻相互鼓励，生离死别之际相约无论遇到什么折磨，决不允许自杀，一定要坚持到再团聚的那一天。父亲特意到附近的利生体育用品商店买了一对加厚的护膝，作为送给母亲的临别礼物，以防被揪斗跪地时可以保护膝盖。妈妈说：“别省这个钱，你也该为自己买一对护膝，以防万一。”

爸爸说：“你放心吧！三线目前还很安全。”

父亲走后，红卫兵无法揪斗他，只能疯狂地拿可怜的母亲出气，最终将母亲折磨致死。父亲到西南后的头几个月，准时一周一封平安家信。最初发自云南沾益工地，后来发自富源工地，再后来是甘洛、泸沽、西昌、会理……

但从1967年三四月起，突然整整两年杳无音信，母亲一边随时被造反派挂牌揪斗，每天要扫厕所、跪门洞，一边时刻挂念父亲的处境，在双重的心理压力下，苦不堪言、心力交瘁，患了多年的心脏病迅速恶化。

我受妈妈的委托，顶着狗崽子的帽子三番五次找铁道部有关部门询问

父亲下落，遭到多次训斥、盘问，最终找到两份有关材料。一份是铁路分局党委发来的要选汪良圃同志为施工前线的“先进个人”的请示，一份是当地“革委会”要揪斗国民党潜伏特务汪良圃的通告。两份材料相互矛盾，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但有一条使奄奄一息的母亲稍为宽慰的是，人还健在，没出什么大事。

1970年4月8日，母亲病危住院抢救，当时父亲已在湖北沙洋农场劳动。4月9日我发出“母病危，急回京”的电报，但一直拖到4月16日父亲才被允许回京，那时母亲已经神志昏迷、不省人事好几天了。这是1966年9月以来全家第一次在母亲病床前团聚，几天来妈妈对亲人的呼唤已经没有反应，但当爸爸走到床前大声说：“竞华，我平安回来，看你来了！”妈妈竟奇迹般地从被窝里艰难地伸出了手，摸索着触到爸爸的手，一把紧紧地握住摇了好几下，脸上露出幸福、熟悉的笑容，接着我看见妈妈的眼角流下了热泪。

这是父亲、母亲最后的心灵呼应。妈妈显然在告诉我们，她遵守了决不自杀，坚强地挺过来一直等到重新团聚的诺言。

幸亏母亲没能睁开眼看看父亲，否则她会非常心疼的。

因为经过三年多的折磨，父亲几乎已经认不出来了，不但又瘦又老，右手食指还断了一截，当我们问起这几年的经历时，他仅淡淡一笑说：“一切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吗？反正活着比死去需要更大的勇气！”

直到他去世后我整理他的日记时才知道，他在离家三年多里受尽了各种非人的折磨，多少次因实在承受不了痛苦欲选择自杀，但都因想起临别时与母亲的承诺而作罢。

父亲写一手好字、画一笔好画靠的都是他的右手。“文革”中一些嫉妒他年年被评为先进的小人，找到了发泄的机会，想方设法地折磨他，经常有意殴打他的右手。后来听说音乐界的造反派在批斗刘诗昆、殷承忠时也重点殴打他们的双手，手法如出一辙。父亲有一次与造反派一起搬一块大石头，刚把重物抬起，对方不打招呼就撤了手，父亲迅速撒手已来不及，

右手掌被整体压碎，右手食指被压断，好友邵二南工程师（北京市原副市长陆宇澄的老岳父）费力地在石块下找到断落的一寸长血淋淋的食指，急忙送交医生希望能给接上，但造反派们说对一个历史反革命还费那个劲做什么，抢过断指从窗口扔了出去！

从此，父亲再也画不出铁道部常作为样板的精美的工程建筑图了。

1995年10月，85岁高龄的父亲因患肺癌住进羊坊店铁路总医院，经多方治疗病情仍不断恶化，他自己对病情心中有数。一天，他换上盛装要求我们把他带到新北京火车站（现在叫北京西站）的建筑工地看看，他一边颤巍巍地努力站直了身体，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我可能等不到建成的那一天了，我虽然不在但你还能活很多年！”一个月后父亲驾鹤西去，把一辈子献身给铁道事业的老人留下了最后一张照片。



在新北京火车站工地，爸爸留下了最后的一张照片

3. 我的母亲

母亲叫马竞华，生于1915年5月22日，卒于1970年5月27日，享年仅55岁。自父亲认了童校长为过房爹后，童家对他的关怀真可谓无微不至。当父亲年满18岁时童家就开始在学校里的数百个女学生中为父亲物色对象。

由校长亲自张罗，校长夫人把关，爷爷与奶奶进行初选，紧张的淘选工作暗暗地进行了几年，最后选中的三人都是百里挑一、出类拔萃的人才。三人中究竟哪一个最合适呢？最后由父亲自己拍板。就这样，1931年冬天17虚岁的母亲嫁给了22虚岁的父亲。

后来我对母亲开玩笑说：“父亲是千里挑一被过房阿爷选上的太子，您是千里挑一被爸爸选中的王后，我们子女肯定具有良好的遗传基因，考上男四中、师大附中本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童校长的眼光确实敏锐、准确。母亲聪明、美丽、温柔、贤惠，对父亲体贴入微，对子女言传身教，把家营造得和睦温馨。我从没见过她着急上火、大声说话，遇到任何困难都方寸不乱、从容应对。在我一生的经历中遇到过许多出色女性，但还从没有遇见过一个像母亲那样完美的。她在子女的心中威望极高，她的严厉都在和蔼可亲、婉言轻语中体现出来。虽然从不大声斥责，但我们对她的每一点要求，都会拼命地去完成，唯恐不能使母亲满意。



集江南女子聪明、能干、温柔、贤惠于一身的妈妈

多年后发现我经常与孩子们存在代沟，相互很难沟通，时而产生摩擦，孩子们逆反心理很重时，我常想学习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方法，但无法得其

要领。

母亲的聪明机智是深藏不露、长在骨子里的。只有当家庭遭遇重大变故、面临艰难决策时，她超强的冷静细密、审时度势的本事才显露出来。

1941年父亲在浙江省公路局工作时期，由于杭州沦陷，公路局搬到浙南丽水的农村安置。父亲像往常一样整年在建设工地出差，无暇顾家。一次他携带巨款去江山、上饶一带筑路，临走前把母亲和6岁的我、4岁的妹妹寄托在兰溪的一个朋友家，答应一个月后来接。谁知父亲走后没几天风云突变，日寇长驱直入占领金华直逼衢州，将浙江省横腰切成南北两块。兰溪紧挨着金华，一夜之间全城陷入一片混乱，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比比皆是。

父亲的朋友决定第二天逃长沙转重庆，问我们的打算。当时摆在母亲面前的出路有三条：一是就地不动等待父亲来接；二是冒险穿过战线到丽水找浙江省公路局；三是在浙北农村找地方先躲避一阵。

朋友们都建议采取第一种方案，并客气地把房屋钥匙交给我们，说要住多久都行。他们的理由是父亲出差的江山县目前尚未被日寇完全切断，父亲肯定会千方百计来兰溪会合，接了家眷一起逃难。

但母亲出于对父亲的了解，力排众议地认为现在兵荒马乱，携带巨款非常不安全，父亲肯定会不顾一切先回丽水到公路局交代工作，把公款还上，那时恐怕兰溪也就沦陷了。因此，在此守候是下策。冒险穿越战线到丽水去更不可行。唯一的办法是先找个地方躲避一阵。

决策已定，如何实施？

母亲想起父亲、叔叔曾与这一带的江上的船工混得挺熟，当时江南的水码头船工都讲究江湖义气，不乏侠义豪爽之士。有几个在父亲的工程中承包过砂石料运输的船老大还曾被父亲邀请来家里喝过酒。母亲用最快的速度找到了这些人，述说我们的困境。他们说：“恩人遇难，我们定两肋插刀相助！”在他们的安排下，我们母子被迅速用船运到浙江与安徽交界的大山深处住下。

事后得知，母亲的分析完全正确，父亲果然先携款经千辛万苦回到丽水，结清账后再想来兰溪已不可能，兰溪在我们离开后的第三天被日寇占领，我们住过的房子也被一把大火烧得精光。

船老大用船溯富春江（今称这一段江为新安江，但我们仍喜欢它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而上，把我们带到淳安以西靠近屯溪的一个码头，弃舟登岸步行十来里山路，安置在他的远房亲戚姓郝的寡妇家，母亲让我们叫她“好姑姑”，叫她两个比我大几岁的儿子为“好哥哥”。

没几天，母亲与“好姑”已亲同姐妹，我与“好哥”们也相处得很好。他们带我上山砍柴、采野果，下河摸鱼、捉泥鳅，完全忘记逃难的危险与艰辛，天天高兴得像过年似的。所有的生活重担都压在母亲瘦弱的肩上，她帮乡亲、船工们缝洗衣服，学会了砍柴烧炭、割草养鹅，并把炭与鹅拿到集市上去卖，以养家糊口，这对于一个从小生长在上海的二十多岁的年轻妇女来说是何等不易！

更使母亲倍受煎熬的是父亲的安危，她几次化装成农妇冒着遭遇日本兵、国民党败兵及土匪的危险，到江边托船老大打听父亲与叔叔的消息。大约在1942年秋的某一天母亲从江边回来高兴地告诉我，已取得与父亲的联系，他现在江西省公路局工作，要我们尽快穿过封锁线与他团聚。

“好姑”听说后坚决阻拦，去江西的路要通过几道封锁线，大路上有日本兵、国民党兵，小路上土匪如毛，你一个单身妇女带两个孩子如何去得？

经母亲再三坚持，“好姑”给我们想了个法子：当时沿海全被日寇占领，内地食盐供应十分困难、盐价很高，当地有些村民冒险从事偷运私盐穿过封锁线的营生，“好姑”有个外甥近期要出一次货，唯一的办法是求他带我家同行。

为此，“好姑”杀鸡、打酒请他外甥吃了顿饭，酒桌上把母亲情况向他作了介绍。“好姑”说：“这是我的干妹子，你这一次就少推些盐把她全家三口捎过去，用你的命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个憨厚的山民爽快地答应了，

但一再嘱咐要作好遭遇各种艰辛、危险的思想准备。

1942年冬，天气奇冷，是贩私盐的大好时机，我们一伙共二三十辆独轮车（当地叫鸡公车）。每个车夫带一支火枪，每辆车两边捆绑两麻袋盐，足有上千斤重，“好姑”外甥的独轮车上麻袋没装满，但上面多捆了两个竹篓，这是我与妹妹的专座。我们俩穿着臃肿的棉衣，外面还裹着棉被，手里捧着一根灌满了黄酱的竹筒与一包贴饼，这是“好姑”给母亲精心准备的路上伙食，一股脑儿生生地塞进竹篓，这支贩私盐队伍就吱扭吱扭地上路了。

队伍专走最崎岖的险道，不断地在崇山峻岭中穿梭。据我后来实地考察，当年我们肯定走的是穿黄山，沿九华山、圹岨山，再翻大茅山到上饶的山路。几十年后我专程故地重游，风景依旧，当年的贩私盐的山路今日已成为黄金旅游热线，我多次在崎岖小道上逗留遐想，希望能在心灵上唤起魂牵梦萦的母亲、热情率直的“好姑”、憨厚淳朴的山民的身影。

当年的好风景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只记得道路险峻难行，隆冬季节，时而风雪大作，时而浓雾缭绕。一边是刀削斧凿似的悬崖，一边是望不见底的深谷，羊肠小道被冰雪覆盖，走一步滑一步，每步都有生命危险，母亲实在不敢走这样的路，只好用绳把自己拴在独轮车后拖着身子走。

开始，盐贩子们嫌母亲走得慢，是队伍的累赘，但经过一件事后他们不仅不嫌她累赘，还把她视为救命恩人，队伍的主心骨。

一天，我们路经皖南一山村时，突然被一群来路不明的队伍包围，他们穿着各种样式的军装，盐贩们以为是国民党的败兵来抢盐，先开了火。在双方鸣枪对峙的冲突中有几个盐贩子被俘，人、枪、盐全部被扣押。正当他们不知如何应对时，母亲偶尔发现在喊话中对方有几个说很纯的上海话的女子，言谈举止文明礼貌不像坏人。于是，母亲主动出面试谈，才发现他们是新四军。经过母亲疏通，盐贩们卖给新四军一些盐，新四军把被俘人员、枪支、盐全部送还，并留我们在他们驻地休息。两天后，母亲与新四军里几个上海女学生才依依惜别。

穿过封锁线时我们天天昼伏夜行，虽然曾多次听到过枪声，见到过敌伪的碉堡与被烧毁的村庄，但没发生什么大的险情。仅母亲几次在深雪中滑落山崖，幸而被鸡公车上的绳子拴住才脱险。经过半个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在1943年大年初一那天到达上饶，登上父亲事先联系好的汽车。汽车直接把我们送到当时江西公路局的所在地——位于赣南于都、宁都、兴国三县交汇的山窝窝里一个叫银坑的小镇，几十年后我才知道这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

母亲晚年身患严重的心脏病，发作时每夜不能平卧，只能倚靠在床头喘气。但她在生命终结前的最后几年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浩气凛然的气概至今使我热泪盈眶。



我们熟悉的妈妈的身影

1966年8月23日我们家被抄，等我闻讯赶到家时，家里已一片狼藉，母亲显然挨了揍，脸上胳膊上都有皮带抽过的痕迹。她见到我说：“红卫兵是冲着你爸爸来的，对我这个家庭妇女他们能栽多大的赃？你放心，我能顶得住，你赶快骑车去铁道部看看你爸爸那边的情况。”

当天晚上父亲不仅平安回来，而且还带来被单位任命为野外队技术负责人，近日将动身去三线修建新铁路的消息。母亲立刻从打击中恢复过来，

用布满被皮带抽打的伤痕的双手，哆哆嗦嗦地收拾起父亲出差的行装。她以为父亲出差三线，红卫兵无法揪斗，事情就会逐渐平息下去。

但事出意外，从此以后这批红卫兵频频光顾我家，矛头对准母亲，口号由“深挖、狠斗国民党潜伏特务”改成“揪斗国民党特务的臭老婆”，三天一批斗，五天一殴打，母亲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我气愤不过，找了几个我单位的好友也带上红卫兵袖套闯到灯市口中学红卫兵总部与他们论理，话不投机双方接上了火，有个“红五类”出身的叫杨会年的朋友竟与他们推搡起来，这些中学毛孩子根本经不起揍，但挡不住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发泄一阵后，怏怏而归。

后来了解到揪斗父亲是假，打击母亲泄私愤是真。当时我们住在王府大街的铁道部宿舍，母亲不久前刚被评为东城区“先进妇女”，当选东华门地区的街道办主任。父母双双先进、子女个个出色，在铁道部家属大院中传为佳话，也引起一些人的忌妒。

同院的邻居中有一家，一直垂涎这个“先进妇女”、街道办主任头衔，但在选举中票数少于母亲而落选。于是恼羞成怒，为发泄妒恨搞臭母亲，通过他们在灯市口中学上学的子女招来一批不明真相的红卫兵来我家扫四旧。好心的街坊邻居实在看不下去，悄悄地把实情告诉我们。当母亲了解真相后冷静地对我说：“原以为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牵涉我，当父亲出差后他们无法揪斗，我就可以解脱了。现在看来，既然有人一心一意想搞臭我，事情就不会很快摆脱。”

接着，她十分清醒、果断地作了几项应对安排：“我已想清楚，第一，我作好了吃苦受辱的准备，天塌下来我顶着，咬牙挺过这一劫。第二，我最担心的是你爸爸，要加强与他联系，对北京情况要报喜不报忧，以免他惦记。第三，孩子们千万别介入此事，你们在自己单位参加运动，街道无权过问，一旦介入街道就可按现行来抓，就麻烦了。第四，大哥穿军装，妹妹身体差，小弟尚年幼，在这最困难的时候你本应多出力，但不料你竟如此幼稚、鲁莽地跑到学校去论理，这只会给我帮倒忙，以后再别干这种

傻事！”

果然，在我到灯市口中学去论理的几天以后，他们对母亲的批斗变本加厉。9月上旬的一天，红卫兵通知，在街对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场内召开批斗黑帮大会，要抓母亲去陪斗。接着来了一批人一把揪着母亲美丽的长发剪了个阴阳头，脖子上挂着反革命分子的大牌子，拖到会场跪在地下被众人推搡、唾骂。

听到这消息，我悲痛欲绝，由于我的愚蠢，母亲遭受如此奇耻大辱，我永远无法饶恕自己。那天回到家面对被剃了阴阳头、满身伤痕的母亲，我撕心裂肺、长跪不起、痛哭流涕。

母亲冷静地说：“去学校论理，是你的一片孝心，但你有勇无谋，以后要接受教训。我到人艺陪斗，不一定与此事有关，即便你没得罪他们，他们照样会整你。开始我的确害怕，敲锣打鼓、人山人海，谁见过这种场面，跪定后发现旁边还跪着于是之、舒绣文等艺术大师，舒大师也与我一样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他们挨打比我多，他们能挺过来我也能挺过来。经历过这种场面后我更坚强了，有这碗酒垫底，什么酒都能对付。”



1966年妈妈51岁、我31岁，摄于“文革”前夕的北京

母亲是个忠诚的戏迷，痴迷京戏与话剧，经常把省吃俭用的钱花在到对面的人艺或护国寺人民剧场看演出上，到了这光景还诙谐地用戏文说事。

母亲拖着重病的身体，遭到各种非人的摧残，一直咬牙坚强地挺了四年，等待着乌云过去、全家团圆的日子，最后在病床前弥留时刻才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我一辈子中无数次陷入绝境时，总会在耳边响起母亲的话“天总归是要亮的”，使我学会面对困难坚强不屈。

4. 我的哥哥

我哥哥叫汪成为，1933年7月25日生于上海。

前面叙述的内容中很少提及我哥哥，原因是几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都远离我们，单独与外公、外婆居住在已经沦陷的上海。

我们家逃离战火中的上海是采取化整为零、分批撤离的方式。

1938年父亲先撤，在浙江省公路局找到工作后通知我们。1939年母亲带着四岁的我和两岁的妹妹第二批撤，经过千辛万苦挤上了逃难的轮船，差点没把我挤丢（后面将详述）。当时六岁的哥哥按照外公、外婆的要求暂留上海与他们做伴，打算等局势稳定后第三批再撤。

谁知全面抗日战争一打就是八年，1943年以后上海生活十分困难，外婆身体日益衰弱，实在无力照顾我年幼的哥哥。恰好此时我们在江西银坑这个世外桃源安居乐业，是抗战中生活最安定的时期。父母十分挂念身陷上海的哥哥，希望早日把他接来全家团聚。

难题是如何带孩子穿越封锁线。根据几年前母亲带我们穿越封锁线的经验，我们写信给居住在浙江富阳的叔叔，询问把巍巍（哥哥小名）带过封锁线的办法。

叔叔回信说，只要有人把哥哥从上海带到富阳，他将亲自护送他来银坑。

1944年初，外公结识了一个往返于上海、富阳跑单帮的商人，他同意带哥哥去富阳。

临行前外婆用灰布缝了一个包袱，里面除几件替换衣服外，还有一张

写着叔叔姓名、地址的纸条。考虑到孩子太小，身上带钱不便，旅途费用全交此商人保管。不知是否有意，当他们坐火车到杭州车站下车时，这位商人与哥哥走散，他带着钱消失在人群中。

十一岁的哥哥在临行前被告诫：一旦走失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走失地点死等。

于是，他在火车站整整等了三天。身无分文的他夜里蜷缩在墙角过夜，白天在车站口张望，饥饿难忍时就找旅客们吃剩丢弃的食品充饥。三天过去没见人影，哥哥意识到再找到此人已无任何希望，便寻找开往富阳的长途货车，哀求司机将他捎到富阳。遭到多次拒绝、多少白眼后，终于一天遇到一个好心的拉棉花的卡车司机，同意免费把他捎到富阳。他按照地址，一路打听一路问，最后找到了叔叔的住地，但当时没见到叔叔的人影。

据后来叔叔的解释：他当时在盐业公司工作，穿梭于敌占区、国统区、红军区，倒运油盐酱醋、日用百货，居无定所。在约定的时间里他确实等候了好几天，但不见人影，以为计划有变，就离开临时住地去办事了。直到一个月后收到上海与银坑的来信，才知孩子丢失，开始着急地到处寻找。

哥哥打听到叔叔常在船码头一带出没，于是就沿江挨个码头去寻找。对一个在上海外婆宠爱下长大，从未出过门的十一岁孩子，面对陌生的城市、偌大的江面，如何寻找亲人？唯一办法就是掏出纸条，逢人便问：“你们有谁认识汪葛圃？我是他的侄子，求好心人帮我找找！”

叔叔没盼到，却招来了日本兵。

当时日军主要占领交通枢纽和大城市，对中、小城市仅隔三岔五地扫荡一次。那一天江码头忽然涌来大批难民，纷纷传说日军要扫荡富阳城，争先恐后地上船逃命。哥哥也被裹挟上了船，溯富春江而上向安徽方向逃亡。

据我推测，很可能与几年前母亲带我们逃亡时走的是同一条路线。船到目的地后难民们都下了船，唯独哥哥死活不肯离船，苦苦哀求留在船上打工，混口饭吃。船老大看他可怜留下了他，从此船上多了个十一岁男孩

的身影，帮船工们买菜烧火、洗碗擦舱，吃些残羹剩饭。这是他离开上海在外流浪多日后第一次有了个能固定睡觉的窝。

叔叔知道丢失了侄子后，焦急万分，暂把生意放在一边，全力以赴寻找孩子。到处托人打听，满街贴寻人启示。后来从船工们口中得知有一个流浪男孩被某船老大收留，于是沿江逐船寻找。三个月后，在桐庐县一个码头的船上发现有个破衣烂衫、骨瘦如柴的打工小孩，走上前询问才知确是巍巍。

父母经历了几个月丢失孩子的痛苦煎熬后，终于在1944年秋天收到了叔叔已找到哥哥的喜讯，叔叔告之不日可带他来江西银坑团聚。

见面的那天全家盛装在汽车站欢迎。汽车到站后，旅客们鱼贯而出，大家挨个儿盯着都无法辨认出亲人。这不仅是由于分别了五六年变化很大，更由于哥哥在临行前又出了事故。当时富春江是敌、国、共几方武装力量拉锯式占领的地区，枪支弹药扔得满处都是，哥哥在船上打工时与船工们下河洗澡，江底常发现有黄澄澄的各种子弹，哥哥收藏起来作为玩具，其中几个没打响的瞎弹，叔叔说这里面还有火药是易燃物，坐汽车不允许带，哥哥听说里面有火药喜不自禁地设法把子弹头拔下，把火药倒出来堆在一起玩起放烟火游戏，可能子弹泡在江水里受了潮，火柴点燃后往火药堆中一扔，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哥哥就凑到跟前去吹一吹！

轰！一声巨响……

哥哥痛苦地抱着头在地上打滚。送到医院检查，半个脸严重灼伤，熏得漆黑，头发、眉毛、睫毛全无，幸亏躲避得及时没伤着眼睛，真是万幸！

妹妹从小离家对大哥毫无印象，仅从相片上认识他，一时间看见面前这个“叫花子”与相片里漂亮、英俊的哥哥完全不像，吓得躲在妈妈背后大哭大喊：“这个丑八怪不是我哥哥！”

这就是全面抗日战争八年里的第一次全家团聚。

这一段颠沛流离的经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煎熬培养了哥哥坚毅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使他受益一辈子。

1950年随父从南方来北京，他克服基础差、底子薄的状态，经过顽强拼搏考上了师大一附中。毕业时作为师大一附中成绩最突出的优等生被北京师范大学挑走，免试入物理系学习。



在师大一附中上学时的哥哥

1957年，由于品学兼优，哥哥被国防部选中为保送苏联学导弹设计的研究生。

我当时在苏联收到他将来莫斯科国防工程学院攻读副博士的信后，极其兴奋并提前到莫斯科等候迎接。但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破裂，从那一年起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军事保密专业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协议。

派遣哥哥留学苏联的计划搁浅后，组织上提出三个方案，任他挑选：一是改一个普通的专业继续去苏联留学；二是挑选国内任何一所大学去读研或任教；三是入伍到国防系统搞攻坚课题研究。

哥哥从小受父母“为民所用”思想影响，当即表态坚决去国防部。因为不久前刚听过中央有关文件的传达：“要搞中国自己的原子弹、导弹。”他欣喜地认为这是一个把自己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人民的极好机遇。

哥哥把一辈子都奉献给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他长期在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带领下承担过许多重要国防科研任务，硕果累累，但默默无闻。



我的哥哥，中国工程院院士

民间略有所知的是他曾担任国家“863”项目信息领域的专家组组长，被科委领导称为我国的“战略科学家”。

据《中国 863》一书介绍，他逻辑严密、思维清晰、条理分明、能言善辩、口才极好，具有一流的思维、组织、表达能力。

哥哥是资深院士，目前行政职务已退二线，但继续承担一些科研任务。



给领导们讲课

5. 我的妹妹

妹妹叫汪成源，1938 年 3 月 22 日生于故乡奉化。在 1949 年有了小弟

以前，她长期享受小宝贝疙瘩的待遇。

1949年以后虽添了个小弟弟，她仍是四兄妹中唯一的女孩。因此，她一贯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娇生惯养。她从小有个外号叫“蚌壳精”。江南每逢佳节游行队伍中除舞龙灯、划旱船外，总有几对扇着巨大的贝壳扭来扭去的漂亮仙子，用现代的语言可称为珍珠宝贝。

但“蚌壳精”三字用上海话来发音接近“碰哭精”，就是一碰就哭的能手，惹不起的瓷娃娃。“哭与吃”是妹妹幼时的两大技能。

当父母去上班时（母亲曾担任过小学教员、公路局职员等），把妹妹交给我照看。她只要抱着一个饼干箱，里面放几块苏打饼干，就可以在床上坐一天，每隔一刻钟必打开饼干箱数数里面饼干少没少。

有时我馋，细声细语地与她商量：“乖元元（妹妹的小名）！让我也吃一块饼干好吗？我给你抓几个蚂蚱去！”

她经常不说同意或不同意，只放声大哭。我只好放弃这“非分之想”，耐心地等她睡熟后偷吃几块，但一旦她睡醒后发现数目不对时，更要号啕大哭一场。

妹妹惹不起，更躲不起！

有时我厌烦了想到屋外转转，或方便一下，没等一泡尿撒完，一准从屋里传来哭声：“妈妈叫你看我，你自个跑哪里玩去了，我一个人害怕！”

妹妹上学后，妈妈要我除上学、放学同行保护外，课间休息时也尽量抽空去看看。有好几次课间时，我见她独自一人在墙角抽泣。同学中有些淘气的男孩专爱逗漂亮娇气的女孩为乐，所以妹妹今天受张三欺负，明天被李四捉弄。于是，我又有了一项新任务，每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堵截那些淘气包，卷起袖子、瞪圆眼睛，装着要拼命的样子：“你再欺负我妹，我与你单独练练！”

一般情况下，对方慑于我凶煞般的架式都会服软、求饶。

但有一次我堵截一个叫郭胜华的“刺儿头”，他不但没害怕反而说：“谁

怕你，我早憋着劲儿想和你较量较量！”

我们俩从路上扭滚到沟里，再从沟里扭滚到竹林里，打得天昏地暗。

回到家我对妹妹说：“我今天好好收拾了郭胜华那小子，但恐怕妈妈一会儿就要收拾我了！”原来，我发现在打架时，刚穿上的新裤子被拉了尺把长的口子。

妹妹安慰我说：“你撅起屁股我帮你缝上，我的针线活特好，保证妈妈发现不了。”妈妈下班后，在昏暗灯光下果然没有发现任何破绽。但晚上睡觉时我却无法脱下我的长裤，一脱就露出光屁股，原来妹妹把外裤与衬裤缝在一起了。我只好向妈妈坦白，把妈妈笑得在床上翻滚：“元元，以后全家的破衣服都由你来补！”

遗传基因确实是极深奥的怪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原来懦弱、害羞、娇气的“蚌壳精”妹妹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聪慧美丽、决策果断、办事干练的小精灵，活脱脱是妈妈的翻版。

如果说1944年六岁的她与我双双登台出演京戏《二堂舍子》时还有些胆怯的话，接着出演话剧《朱门怨》我们兄妹俩有大段对手戏时，她已能驾轻就熟，时时获得掌声。后来一发不可收，唱歌、跳舞、京戏、话剧样样上手，俨然成了当地的一个小明星。

1948年湖南衡阳组织全市中小学生演讲比赛，我们粤汉铁路局从铁路中、小学（当时叫扶轮中、小学）选拔三名选手，代表铁路系统参加高、中、低三个组的比赛。凑巧选上哥哥、妹妹和我去参赛。

那天，兄妹三人在校长带领下乘船过了江，来到船山中学礼堂，面对坐满了礼堂的几百名观众，妹妹毫无畏惧地第一个上了台，她的演说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她的成功鼓舞着我和哥哥，结果我们三人包揽了高、中、低三个组的第一名。学校给我们隆重颁发了奖品，铁路局门口贴了大红喜报，爸妈脸上乐开了花。

由于我们三兄妹在粤汉铁路局的知名度以及1949年父亲在抢修被国民党破坏的铁路工程中立了一等功并荣获“劳动模范”称号，在粤汉铁路恢

复通车的隆重剪彩仪式上，妹妹被特邀作为礼仪童宾去牵彩带，由叶剑英来剪彩。这是我们第一次与中央高级首长的接触，二十年后，我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地震工作时，见到了叶帅，还一起回忆了那次的剪彩活动。

1950年我们全家北上赴京，妹妹看到哥哥考上师大一附中、我考上男四中后，她向妈妈表态决不落后于哥哥们，也要考上北京市的尖子学校。几个月后她果然考上师大女附中。好强逞能的性格给她一生带来许多成功，也遭受一些磨难。



在师大女附中学时的妹妹

1960年我留学苏联回国后，见到五年未见面的妹妹，她已成为体弱多病的林黛玉了。据说在“大跃进”时期她是闻名的铁姑娘，带领同学与工人们日以继夜大炼钢铁落下一身疾病，接着三年困难时期又带头少吃粮、熬野菜，身体更加虚弱。有几次她由于风湿发作全身瘫痪，不能行动，由我背着上医院抢救。

最使我感动的是，就是这个体弱多病的妹妹为我家做了一件使我终身难忘、至今感到汗颜的大事。

自1966年8月23日我家被抄家、母亲被揪斗后，红卫兵隔三岔五地来骚扰，勒令母亲每天要打扫厕所，并把她剪了个阴阳头跪在门洞示众，被人随意推搡唾骂，把多年患严重心脏病的母亲折腾得死去活来。

看到奄奄一息的母亲，我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作为一个血性男儿，却不知用什么办法才可保护母亲，使她少受折磨，我深感极端无能。我曾天真地去学校与红卫兵论理，结果不但没有效果，反而给母亲带来更大的不幸。

我明白，唯一的办法是采取周总理保护老干部的措施，将人转移隐藏起来。但到哪里去找安全的避风港？

父亲那儿自身难保、哥哥那儿是保密部队，只剩下我与妹妹处可供选择。按说我理应挑起保护母亲的重担。一天，我闯进研究所革委会，向头头们提出借房要求，别看平日关系不错，那些人一旦大权在握满嘴唱高调、打官腔！

“你自己是白专典型、修正主义分子。你妈在街道挨批斗，我们若接纳了她，这可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问题！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

正在我一筹莫展时，妹妹勇敢地站了出来，她不知用什么办法说服了革委会与两派的头头，不仅借到一间教室，而且床铺、桌椅板凳一应俱全，走廊里支起爸爸临行前特地为妈妈手工打造的煤油炉，布置了一个理想的避风港。

现在剩下的唯一难题是母亲如何取得街道批斗小组的批准，名正言顺地离开这个苦难深渊。我与妹妹一致同意先去医院看病，托人开出需要住院的证明，将母亲从医院直接送钢院。

由我拿着医院住院证明到街道革委会去请假。

就是这个从小懦弱、胆小、体



大学时代的妹妹

弱、多病的妹妹，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勇敢地保护了母亲，做了我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使母亲在极端恶劣的“文革”环境下多活了几年。

在我们家庭的历史中，在最困难的关键时刻总会涌现出勇挑重担的女性，巾帼不让须眉。

当年爷爷私塾倒闭，全家六口生活无着时，正是奶奶用一根银针帮助全家渡过了难关。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与我们被日寇阻隔，母亲孤身带着两个幼儿，冒着生命危险，隆冬季节长途跋涉，成功地穿越了日伪封锁线，全家得以团圆。

“文化大革命”中母亲遭受非人折磨、奄奄一息，大家束手无策时，妹妹勇敢地建造了避风港保护了病重的母亲，延长了她的生命。

妈妈最爱看梅兰芳的《穆桂英挂帅》、杜近芳的《谢瑶环》等巾帼英雄的戏。常用戏词“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来鼓励自己，教育子女，妹妹也继承了这一传统。



当教授后与爸爸合影

6. 我的弟弟

弟弟叫汪成用，1949年9月29日生于广州。

1949年春，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粤汉铁路管理局决定由衡阳搬到广州。我刚上扶轮中学初一不久，只好退学随家南迁。

当时的广州人满为患，住房紧缺，物价飞涨。尤其爸爸领的工资是“金圆券”，它一天之内可贬值好几次。我记得每到发薪水那天，全家出动紧张得如同救火一样；首先爸爸摸着黑早起到珠江边排队，争取搭上第一班船到二沙头（粤汉铁路临时办事处）尽早领到工资，哥哥接过钱跑步抢先过江把钱递到我手里，我跑步把钱分送到已在粮店排上队购粮的妈妈或在钱币兑换处排队的妹妹手中。

这种一环扣一环的接力赛一个月至少上演一次，万一哪一棒稍微迟缓，赶上“金圆券”缩水，可能使全家整个月处于无米下锅的状态。

为了节约开支，渡过难关，我与哥哥只好放弃到广州最著名的广雅中学学习的机会（已考取），辍学在家。哥哥为了帮父亲分担生活重担，利用铁路部门职工家属可免费乘火车的便利条件，与邻居们合伙干起了去九龙、深圳跑单帮贩卖香烟的营生。

更为严重的是住房问题。当时广州集中了全中国的富人：一等大款候机飞台湾，二等大款候船渡港澳，三等大款坐镇广州当寓公。大家都拥挤滞留在广州，市内住房顿时处于僧多粥少、十分紧缺的状态。粤汉铁路局虽腾出一个大仓库供从衡阳迁来的职工家属居住，但考虑到妈妈产期临近，与大家一起挤大仓库有诸多不便，我家只好另想他法。

最后通过一位熟人的亲戚租到东川路东城街七号的一间十平方米的没有窗户的小房。房况很差、房租很高（月租32块袁大头），但已别无选择。好在它是个四厢合拢、中间带天井的那种中式老屋，房屋虽小，但屋门距天井边的走廊较宽、房檐很长，在走廊搭个床睡觉是足够了。父母带妹妹住在房间里，我与哥哥睡在房外走廊上。

住房问题解决后，亟须找个有接生经验的女佣。当时我们家没有住妇产医院的经济条件，兄妹三人都是由祖母或外婆亲自上手，帮忙接生的。现在老人不在身边，在兵荒马乱、人地两生的广州如何去找接生婆？

吉人自有天相。

邻居中有位列车长的夫人，是苏州人。在语言不通的广东，见到江浙老乡，亲热得不行。同为天涯落难人，她见到妈妈的处境，爽快地说：“汪太太，理想的接生婆现在不可能找到，我们是老乡，接生的事我包了。放心吧，我有经验，可以随叫随到！”

1949年9月29日，这位热心的苏州老乡在床前守了一天，我们兄妹三人在屋外打下手，爸爸在屋里、屋外焦急地转悠，晚八点多钟小弟终于出生了。

由于他出生的年、月、日都带有“九”字，又与新中国同岁——三十几个小时后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以一些热心于卦卜之术的朋友认为，“此孩儿必是大富大贵之人”。

父亲不希望孩子追逐名利，成为大富大贵之人，故而为他取名“成用”。三兄弟名字连读就是“为民用”，与毛主席说的“为人民服务”意义相同。弟弟的小名为“容容”，取其“容易健康成长、容纳吸收人间的宽厚善良、容忍排斥世界的丑陋邪恶”之意。

弟弟从小聪明伶俐，浓眉大眼，十分讨人喜欢，是我们大家的宠儿。父、母、哥、姐都争着抱他、哄他。据妈妈回忆，我出国留学前一阵子，整天把持着小弟弟不让别人沾手，尽兴地逗玩了个够。

在苏联的第一个春节，我曾收到五岁弟弟寄来的贺年片，稚嫩的小手歪歪扭扭地写了几行字：“我快要上学了，我一定努力！将来像哥哥一样去留学，做个科学家！”

留学五年期间为了抓紧学习我一次都没回家。待我学成回国再次见到小弟时，他已是一名优秀的少先队中队长了，家里墙上贴满了他的奖状、小红花。看来父母已把教育我们兄妹的成功经验，全部用到了他的身上。

加之小弟的天分比我们高，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在王府大街小学上学时的小弟

那时北京市实行就近入学制，他考入本区最好的男二中，除了学习成绩优秀外，他加盟的“小红星”乒乓球校队在北京市中学生比赛中屡战屡胜，以他担任领唱的文艺宣传队在北京市多次获奖，他的照片挂在学校门口“三好学生光荣榜”上。我们家注定又要出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了！一切都那么自然、顺畅，那么水到渠成。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自从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来我家抄家的那一天起，一切都颠倒了，彻底改变了小弟的命运。

一夜之间，敬爱的父母变成了国民党特务，挚爱的哥姐变成白专典型、修正主义分子，尊敬的老师变成反动学术权威。连平日无话不说的亲密小伙伴，见面时都生分地躲开了。从小一直是三好学生、优秀队员、优秀团员的小弟突然变成“狗崽子”，谁都不愿吸收他参加红卫兵。

他陷入极端痛苦、迷茫之中。在家里眼看着慈爱的母亲遭殴打、受污辱，他不敢去保护、去安慰。在学校面对火热的红卫兵活动，他又不便去参加、去支持。一方面是十几年刻骨铭心的血缘亲情，另一方面是“保卫毛主席，反对帝修反、砸烂封资修”的号召在心中剧烈地碰撞。原来热情似火的孩子逐渐变得沉默寡言，经常独自静坐在黑暗中长吁短叹，不知所措。

一天，他严肃地问我：“小哥，咱爸咱妈真有问题吗？”

“我出国留学，哥哥入伍、入党都经过最严格的政审。你放心！绝不会有任何问题。”我答。

“不管怎样我再也不能走你们的人生道路了，我要远离家庭，上山下乡向工农兵学习。”他告诉我，学校里来了一位东北农垦兵团的首长，动员高三、高二的学生报名去东北农垦扎根落户。他虽是高一学生，不属动员对象范围，但他也报了名想跟着高年级同学一块走。“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他坚定地说了一句那时极流行的口号。

当时，小弟是唯一与病重的妈妈同住，照顾她吃饭、服药的生活帮手与精神支柱。原以为根据北京市有关文件，他留在城市务工或在近郊插队的可能性较大，我们正为此感到欣慰。然而小弟的决定如同晴空霹雳，出乎大家意料。受打击最大的当然是妈妈，最钟爱的幼子即将离她而去，正在水深火热中受煎熬、奄奄一息的她，今生今世可能再也没有与幼子见面的机会了。

但妈妈始终坚强地没说一句劝阻的话，只是那天弟弟告诉妈妈登车离京的具体日期的那一刹那，她突然失控大哭起来，然后默默地把弟弟拉到床前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他的头。

像是祝福、像是诀别！

她了解自己的孩子，一旦他作出决定谁都无法改变了。几天以后，妈妈把我叫到床边，哆哆嗦嗦地从内衣里掏出她的私房钱。

“敏敏（我的小名），你骑车到大栅栏去一趟，按小容身材买一套做长大衣的滩羊皮筒。”妈妈说。我知道，这是妈妈准备最后应急时的救命医药钱，我拒绝接受。“小容的行装由我们负责，这些是您的救命钱，绝对不能动！”

妈妈显然生气了，苍白的脸上映衬出一丝红晕。“让我最后留给他一个念想吧，他一走，我的半条命就跟着去啦！”

接着，很少求人的妈妈恳求我：“敏敏，你要负责说服他。我担心的是

他要与家庭划清界限，不愿接收我的礼物！”妈妈痛苦地说，似乎孩子的远离是由于父母的过错连累的。

皮筒子买回来后，妈妈挣扎着起床忙活起来，按军大衣的款式在滩羊皮筒外吊一个结实耐磨的布面子。

被抄家后东西乱了套，妈妈称心的缝纫工具都找不到了。一天我发现雪白的滩羊皮筒上有斑斑血迹，再看妈妈的双手，已是横竖布满裂口，正渗着血。她劳作了一辈子的手经常干裂，现在又找不到纳鞋针与顶针，缝制坚韧的滩羊皮筒时，针线常陷入手指的裂口里，勒出一道道血印。

1968年7月，弟弟要走了。

大家强颜欢笑送他上路，妈妈拿出叠齐熨平的皮大衣送给弟弟，果然不出所料，弟弟拒绝了：“妈！您这是干吗？那边是部队，什么都发，用不着这些东西。”

我连忙把弟弟拉到一旁说：“看妈的意思，她已作了与你永别的准备，这是用她的保命钱，带病缝制的血衣，你记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诗吗？你一定要带上它留个纪念。”

弟弟被分配到位于黑龙江北端绥滨县的290农场扎根落户。从此母亲床头多了一张黑龙江省地图，每天呆呆地望着它，眼里充满着期盼。



在黑龙江军垦农场的小弟

两年后弟弟因母病危赶回京时，她已处于弥留状况，昏迷不醒了。这件血衣成为纪念慈母这段痛苦历史的一件刻骨铭心的礼物。

到290农场后，弟弟自觉地按照“脱胎换骨”的要求，吃大苦、耐大劳，一心一意向工农兵学习，做一个优秀的军垦战士。

在那冰天雪地的原野上，他如何熬过那些远离亲人、战天斗地、艰苦卓绝的日日夜夜的？迄今为止我所知甚少，仅通过几封家信可大体感知他的思想脉搏。

1969年在一封信中谈到，冒着零下30度严寒在黑龙江边巡逻，防人偷渡。结尾写道：“我站在江畔，终于看到苏联了，我曾经多少次梦想能像哥哥一样去那里留学呀！但今天我必须从思想深处彻底清除这种念头，踏踏实实地决心在边疆扎根一辈子，做毛主席的忠诚卫士……”

1971年在一封信中寄来一张相片，在一个会议室里，小容手捧毛主席语录正在发言，头顶上方一幅横联写着“向模范团员汪成用同志学习”。

1972年接小容来信，他已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了，是同去北京知青中的较早一批。

1973年来信第一次提到中央有新精神，劳动之余，允许看些书。询问他的高中课本还在不在，是否可以给他邮寄。

当年秋天来信说，他被推荐报考了清华大学汽车制造专业，拼命补习一阵后，信心十足地去赴考，临行前夕接到通知，团部领导以“年青党员骨干不放行”为由，把名额转送给了一个哈尔滨知青。

1974年是24岁的弟弟的最后一次推荐入大学的机会。根据兵团的规定，超过25岁一律不再推荐。不巧，那年唯一来东北招生的是上海音乐学院，赴考者不计其数，因名额有限，要通过考试严格筛选。

对音乐知识接触甚少的弟弟不愿错过最后的机会，鼓起勇气报了名。然而拿起招生简章左看右看却不知该报考什么专业。

钢琴系？不能报，仅兵团报考的就有几个从小练钢琴的音乐世家。民乐系？也不能报，仅黑龙江报考的就有几个全国比赛获奖者。

最后，挑了作曲指挥系。原以为能避开自己弹奏水平低的弱点，谁知无意（无知）中选择了要求最高、难度最大、竞争最激烈的考试。

领到考试安排通知，顿时傻了眼：录取人数最少，东北考区仅录取一名。考试内容最多，不仅没能避开钢琴等乐器演奏，还要考从未听说过的视听练习、和声配器等。

我不知道他如何考试的，只收到他考后寄来的一封短信。“考试难度很大，报考者人数众多，且多数是在专业乐团工作、培训过的学生。东北考区仅录取一名。我毫无希望！……”

考试后，他一心投入繁重的夏收夏种劳动，报考上海音乐学院之事，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1974年8月底的一天，弟弟到团部汇报工作，一个熟悉的团直协理员悄悄告诉他：“好像有你的一封上海音乐学院录取通知书，来了好些天了，团里领导似乎仍不想放行，所以没及时通知你！”

弟弟心急如焚，找领导们苦苦哀求，最后在一个通情达理的领导帮助下，终于同意放行，这才把压下多日的信交给他。当他打开一封被揉搓得像霉干菜的录取通知书时，距注册的截止时间只剩下四天！

假如说军垦的日子是体力极限的煎熬的话，上海音乐学院的日子是脑力极限的煎熬！一种不知如何去拼搏，无从下手、无能为力的煎熬。

全班十六人，一半是从全国文艺团体中选拔来的，几个从民间选上的，也都从小爱好，有一定音乐基础，弟弟入学时在班里属较吃力的一类。

学习之艰难，我可以想象。但令我不能想象的是两年以后，他如何奇迹般地由班上的落后生变成了优秀生，四年以后又成为班上的业务尖子，上海市学习雷锋的标兵。

1978年上海音乐学院停顿了多年后第一次恢复招考研究生，全国的考生蜂拥而来，安静的校园顿时挤得水泄不通。弟弟躲在琴房里写毕业作品，作曲系主任、我国音乐界和声学权威桑桐教授进来问：“大家都在报考研究生，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在老师的鼓励、支持下，弟弟又幸运地考上作曲系桑桐教授的研究生。

在这以后，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播出弟弟创作的交响乐。弟弟在“上海之声”音乐会上获大奖，被专家们评为中国音乐界的“未来之星”，寄予厚望。

有一次，我到上海探望弟弟，恰巧遇到当年去东北招生的老师。

我好奇地问：“东北仅一个名额，你们当时怎么就选中了汪成用？”

他说：“专业分他确实很低，但我们看中他三点：一是素质，二是灵气，三是耳朵。”他又说：“是否录取汪成用，我们也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贺院长、丁院长（贺绿汀、丁善德）拍的板，贺老说专业技巧可以学习，人的素质、灵气与耳朵的听觉能力是很难学的。”1984年小容被来中国讲课的美国著名作曲家L.史密斯教授看中，史密斯邀请他赴美国留学。

他先后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作曲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



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小弟

除获得学校对优秀学生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外，他还不断参加各种规模的作曲大赛，并屡屡获奖，被国内外媒体捧为当时最有前途的中国青年作曲家之一。

正当他的音乐事业如日中天时，一次车祸使他的颈椎严重受伤。经过

两次大手术抢救虽脱离了生命危险，但音乐创作受了很大影响。1990年以后很少再从事艺术创作，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弟弟的人生拼搏并未到此停止，他再次发挥了永不服输的顽强斗志，带病转行攻读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成为一名优秀的计算机专家。

他曾对我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将用音乐与计算机两方面的知识为民所用。”

二、九死一生

我妈说我不应该属猪而应该属猫，因为猫有九条命。

我从小多灾多难，经历过无数次浩劫，多少次在必死无疑的情况下死里逃生。原因不是我从小体弱多病，相反，我体壮如牛，很少生病。

导致屡遭劫难的原因，主要是我出格的淘气与无法自控的好奇、冒险的欲望：进屋不走门，经常翻墙爬窗户。出门不走路，专找沟沟坎坎练平衡。每见路上有堆屎，总想方设法去踩它一脚，或找块砖砸它个天女散花，溅得自己满身满脸屎沫子。

我就这样隔三岔五地出事再出事、惹祸再惹祸中一天天长大。

迄今为止主要的劫难已达八次，也就是说妈妈赋予我的九条命几乎已经耗费光了，现在静等着第九次劫难的来临，不知是否还能平安过坎。已经安然渡过的八次必死无疑大劫是：第一劫，1939年吴淞口遇险；第二劫，1940年碧湖江落水；第三劫，1941年衢州遭鼠疫；第四劫，1943年银坑堕深渊；第五劫，1944年朱溪堡患怪病；第六劫，1948年衡阳车轮下逃生；第七劫，1976年唐山强余震被埋（见本书第三部分第二章）；第八劫，2006年受围攻突发脑出血（见本书第五部分第一章）。

1. 人生第一劫——吴淞口遇险

1937年“八一三”以后上海成为一个被日军团团包围的孤岛。但租界

地区日寇暂没进驻，难民逃离上海的唯一通道是从外滩或十六铺乘船，乘黑夜冒险穿过被日军封锁的吴淞口，就可到达公海。这是当时逃离孤岛上海到大后方的最后机会。

1938年父亲就是通过这条水路撤离上海的，之后他在浙江省公路局找到了工作，来信希望母亲带着四岁的我、两岁的妹妹尽快逃离上海，来浙江省公路局抗日时期临时驻地丽水与他会合。

外公、外婆全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抢购到了船票。这是一种上海人称为“小火轮”的客、货混装船，中舱与底舱装人，船顶篷是敞开的，周围一圈栏绳供捆绑货物之用。

1939年秋，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妈妈一手紧紧拉着我，一手抱着妹妹，肩上还背着行李，无论如何努力都没法在拥挤人群中踏上跳板，进入船舱。眼看船就要起航，她急中生智恳求旁边一位背着行李也在挤船的高大青年。

“对不起，请您帮忙把这个小男孩带着挤上船！”随即把我的小手交给那个青年。

经过一番疯狂搏斗，妈妈终于抱着妹妹挤上了船。上船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我，但在剧烈摇晃的船舱中、昏暗的灯光下，从中舱到底舱转了几个来回挨个查看，足足有两个多钟头，就是找不到我和那青年的人影。

妈妈事后告诉我，她一再反问自己：“那人是骗子？不像啊！”“那人没能挤上船？不能啊！”

她十分自责：“为什么连名字都没有问一声，就把孩子交给他？”

她越想越害怕，只能大声呼叫：“敏敏，你在哪里，快答应一声！”这一惊天动地的呼声，遭到全船人的批评：“不要命了！我们正在偷渡吴淞口，两边都是日本兵。”

也幸亏这一惊天动地的呼声，招来一个好心水手的帮忙，他告诉妈妈，在收缆绳起航时，他在黑暗中看见船顶篷堆行李的地方似乎有活物，以为是宠物就没在意，不妨再上去看一下。

妈妈大喜，放下妹妹就急着要爬上船顶篷，那个水手急忙阻拦说，当

船开后船顶篷摇晃最剧，风大浪高十分危险，连水手都不敢上去。为了帮忙寻找孩子，他冒险爬上去看看。

正在此时，两岸的日军似乎发现了我们的船，探照灯向船体扫来，接着传来枪炮声。我们的船为了躲避探照灯与枪炮，急速拐弯、迂回前进。

冒着生命危险爬上船顶篷的水手从探照灯光中很快发现了我，在船体剧烈颠簸中，我用冻僵的手抓着船边的缆绳正津津有味地欣赏两岸的炮火。更有趣的是我没见到妈妈之前，死活不愿与水手一起下舱。

据后来了解，那个高大青年是来送人的，主要任务是帮亲友把行李递上船顶篷就完事。他可能把我也当作一件行李往顶篷一放就回去了。

我被妈妈招呼下到船舱后，引起全船旅客像看怪物似的围观我。大家奇怪，一个四岁小孩如何能在水手都害怕的颠簸摇晃中，顶着恶风险浪，勇敢、镇静地站在滑溜溜的顶篷上，仅靠抓住一根软绳索坚持了三四个小时？

此时，船已驶入公海，危险海域过去，全船立即洋溢着一片欢乐轻松的笑声，我向旅客们吹嘘刚才看到的热闹场面，妈妈悄悄换下因焦急、恐惧而被汗水浸透的衣服，我完全没意识到这是我人生中遭遇的第一次大劫。

2. 人生第二劫——碧湖江落水

逃出被日寇重重包围的孤岛上海后，我们很快来到抗日时期浙江省临



抗日时我们曾在浙南山城丽水避难

时省会丽水县与爸爸会面。

丽水是浙南一个偏僻的山城，地处温州湾瓯江上游。每逢赶集的日子，穿着奇装异服的山民（长大后才知道他们主要是畲族人）唱着山歌来聚会。从小生长在上海的我感到很新奇，带着妹妹找个岗地的树下坐着看热闹，觉得比在上海时外公带我去“大世界”看麒麟童还过瘾，经常一坐一天忘了吃饭。好在妹妹随身不离手抱着一个饼干箱，饿时填肚子、累时当板凳，日子过得倒也逍遥快活。

但好景不长，当日军侦察到浙江省的许多机关疏散到丽水后，开始了对丽水的轰炸。我们居住的城郊白云山地区，由于正在修建军用机场，自然成为轰炸的主要目标。

一天，我与妹妹正在观看集市。天空上浓雾中钻出几架飞机，飞得很低，但又没有听到空袭警报，一开始大家以为是自己的飞机，纷纷抬头观看。突然飞机用机枪向人群扫射，接着扔了几个炸弹，恰好掉在我们刚才站立过的地方，炸出了一个深坑，刚与我们搭讪的几个老人都头破血流、人肉横飞。幸而我们及时转移到附近的岗地的大树下，才躲过一劫，惊魂未定的父母急忙赶来，见我们兄妹无恙，紧紧抱起我们，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从此，日本飞机几乎天天光临，白云山上的警报频频响起，爸妈三令五申严禁我们外出。（成年后才知道丽水是除重庆外抗日时期遭日寇轰炸最多的城市。）

但躲在家里也不安全。一天，房东发现我们借住的茅草房墙上有有机枪子弹扫射后留下的弹痕，爸爸决定把我们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凑巧爸爸的同事彭工程师的夫人是丽水附近的碧湖镇人，曾在上海上过学，现在碧湖邮政局工作。她曾多次向妈妈推荐，说那里的环境宁静优美，是躲避空袭的理想场所。她们家有空房，丽水遭轰炸后，彭夫人已经把他们的两个孩子从丽水转移到碧湖，并邀请我妈妈带着我与妹妹也随同前往搭伴。

碧湖果然如同它的名字一样绚丽，四周翠绿的竹山层层环抱，中间晶莹的碧溪蜿蜒穿插（现在叫龙泉溪，当时叫碧湖江），一早一晚水雾扬起时，给人一种梦幻仙境般的感觉。当然，这是我七十年后故地重游，寻觅妈妈脚印时的感受。当时给五岁大的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四个小伙伴（彭家也是一男一女）天天可以在河边戏水玩，在岸边打栗子吃。

碧湖是妈妈魂牵梦萦的地方。多年后一提起碧湖，她常陷入甜蜜的回忆：“那地方真是人间仙境！”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找到一片世外桃源当然舍不得离去，但长住朋友家也有诸多不便。主要是彭阿姨太客气，拒收房租与伙食费。妈妈直截了当向她提出，房租、伙食由两家对半摊，另外由她负责给两家做饭、洗衣及照看四个孩子（彭夫人要上班），若不同意，她只好搬走。就这样妈妈成了彭家的管家，每天端一大盆衣服到河边去洗，四个孩子扛着大竹竿跟在她后面，先打皂角豆，给妈妈当肥皂使，再打栗子给自己喂肚皮。

一天，刚下完大雨，河边石板很滑，我们正兴冲冲打着栗子，忽然背后传来妈妈的呼声——“敏敏！”我回头一看，妈妈已滑落河中，被大水冲离河岸十几米远。

我奋不顾身飞奔到河边跃入水中，忘了自己根本不会游泳。我以为只要模仿大人挥臂蹬脚的姿势，就能轻而易举地漂在水面上，但入水后越动越向下沉，唯一的感受就是大口喝水时从嘴边冒出的气泡擦着脸部向上移动，接着我便失去了知觉。醒来时我已躺在栗子树下，身下垫着一条长板凳，我像被晾晒的雪里蕻似的横在长条凳上，头与脚在条凳两侧垂向地面，便于把一肚子水从嘴中倾出。当我苏醒过来时，脑袋冲下的我只能看见一大堆脚。

耳边传来：“谢天谢地，活过来了，没事了！”

后来得知，我跃入水中的同时，妹妹尖锐、洪亮的哭声随即而起，显然她的办法比我更有效。

哭声惊动了附近邮政局的人，彭阿姨与她的同事们先用我们打栗子的

竹竿钩住妈妈，把她从水中拖起。接着沿河下游仔细寻找，结果在落水处下游约百米的地方把我捞出。



疑似妈妈当年在碧湖的落水处

七十年后我故地重游，试图找到妈妈和我落水的地方，从记忆中搜寻当年妈妈的言谈笑容。但时过境迁，除了还是那座山、还是那条河外，其他一切都已毫无痕迹，无从寻觅。我只能沿江岸选了疑似的台阶，岸上有一株大栗子树的地方，献了一束鲜花，默默地寄托我的哀思。

3. 人生第三劫——衢州遭鼠疫

1941年父亲奉命调往浙西公路段修战备公路。考虑到我已到了上学年龄，而碧湖小镇教育质量比较差，我们一家只好依依不舍地告别彭阿姨，举家迁到衢州。

衢州中心小学离家虽不算远，但战争时期处处危险：可能遭遇日机轰炸，也可能遭国民党败军抢劫。安全起见，公路局的职工凑钱包了一辆人力车（上海叫黄包车）接送孩子们上学。我们一车挤了七八个小孩。人挤人、人摞人，打打闹闹十分快乐。

我们班主任姓苏，是个剪短发的中年女老师，我听妈妈叫她苏大姐。她对学生特别好，每天准时在校门口接送学生，每逢下雨天，她还抱一个、

背一个地从黄包车上亲自把我们送进教室。

有一天，我们班上一个淘气蛋上学时书包里带了一件奇特玩具，是一只黄毛的大老鼠。这只老鼠特别乖巧，上课时在课桌里面不吱声，睡大觉，下课后脖子上拴根绳像条狗似的被小朋友牵着走。

我问他从哪儿买的，他说是自己抓的。这更勾起了我的兴趣，我天天死缠滥打地央求他带我去抓老鼠，最后不得不牺牲我视为珍宝、从上海带来的几本小人书《杨家将》作为交换条件，他才勉强同意。

星期天，我们偷偷溜出家门，他把我带到郊区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告诉我只要翻开仓库的破烂什物、碎砖残瓦，常能发现这种黄毛大老鼠，它们不咬人，跑得也不快。凭我们俩的灵巧身手，半天时间果然抓到两只，一只他带回去送好友，一只归我所有。

回到家本想把老鼠宝贝藏起来谁也不让看，但压抑不住用它恐吓一下妹妹的冲动，结果不仅吓着了妹妹，更吓着了妈妈。

“你没听说前些天日本飞机扔了几个细菌弹，传说这地区将流行鼠疫，这些发呆的老鼠，肯定是已经染上日本人鼠疫菌的病鼠！”

按照妈妈的命令，我很不情愿地把可爱的老鼠用煤油烧死，深埋在后院。

没几天，正式通知下来，要求“家家搞卫生、户户要消毒，彻底消灭老鼠，预防鼠疫流行”。但为时已晚，几天工夫，染上鼠疫的病人爆炸式增多，医院人满为患。接着街上陆续发现尸体，全城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工厂、商店、学校一律停止活动，整条街上空无一人，只有救护车呼啸而过。

出差在外的爸爸闻讯急忙赶回来告诉我们：“衢州将被封锁，你们不能在这里等死，要赶快逃离。但考虑到周边地区都拒绝接受衢州灾民，我找到一个熟悉的船老太租了一条船，你们暂在江上躲避鼠疫吧！”

之后两个多月我们一直生活在船上，沿着兰江与衢江，从兰溪、龙游到衢州、常山一带，反复地兜圈子。

我们船不靠岸，吃住在江上，食物由爸爸采购后定时在江边供应。多年后，我曾读过一本小说，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一批谁也不肯接受的犹太难民如何在海上漂流的故事，与我们当时的处境十分相似。

在船上生活几天后，我开始发高烧，这使妈妈处于两难的境地：在衢州城里凡发现高烧者，一律强制送隔离营，听说进了隔离营，如同进了鬼门关，基本有去无回。但若把我发烧的情况隐瞒下来，万一真是传染性极强的鼠疫，不仅我们全家要遭殃，替我们划船的船老大一家三口也难幸免。

思来想去，妈妈采取十分大胆、聪明的做法，她干脆与船老大坦诚地讨论对我的处理意见。通过几天接触，妈妈相信船老大是个十分善良、明白事理的老人。果然，船老大坚决反对送我去隔离营。

他说：“现在孩子患什么病还不清楚，决不能交隔离营去送死。为了以防万一，明天让老伴、孙子回家去住，留下我孤老汉帮你们划船，我已经到了这把年纪了，没什么可怕的。”

第二天一早，船老大把他家人送走，并从岸上又划了一条小船回来，把它拴在大船后面，连成一组母子船。从此小船成了我的专用隔离船。爸爸购买了许多中、西药和各种消毒药水，把船和人都仔细消毒一遍。不知是药起了作用，还是我患的根本不是鼠疫，一周以后我烧退病愈，开始下河摸鱼了。

我们在船上漂流两个月后，衢州鼠疫警报解除，允许登岸进入遭受过灾祸的县城了。两个月不见，全城一片荒芜凄凉景象。劫后余生的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总是：“菩萨保佑，你还活着！”然后相互倾诉，哪些熟人已经不在。

我们小学同班同学中有一半死于这场灾祸，其中包括曾带我去捉老鼠的小淘气与抱我进教室留着一头短发的苏老师。

1995年出版的《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有一篇《日军细菌战调查报告》引用了日本友人森正孝的一段资料，摘录如下：

731部队所研制的细菌弹曾在1940年10月7日至1942年4月18日先

后对浙赣前线衢州、金华等地使用过，共攻击6次，投弹48枚。从效果看，霍乱菌不够理想，没取得预期效果。

而鼠疫菌效果突出，投弹后引起衢州县城及周围13个村庄鼠疫流行，感染率达28%，死亡率达97%。

4. 人生第四劫——银坑堕深渊

1943年春，妈妈带着我与妹妹穿越敌、伪封锁线来到江西银坑与爸爸团聚。

银坑位于赣南山区，四周群山环抱，在没通公路前，离得最近的兴国、于都、宁都县都需要爬一天的山路才能达到。从纪念长征七十周年的资料中得知，这里曾是老革命根据地，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时曾把指挥部设在银坑，著名的兴国、黄陂等“三战三捷”战役就是在此指挥的，当时毛主席居住的地点恰是我们当时的小学校址——洪家祠堂。

在这个与世隔绝、幽深秀美的山区，我们度过了全面抗日战争以来八年中最为安居乐业的一段日子。妈妈找到了工作，我和妹妹上了学，后来哥哥也从上海赶来团聚，江西省公路局还给我们在家属区分配了两大间房子，这是由十几排工棚组成的临时建筑，因地处竹林深处，故取名为“竹林村”。

房屋虽是由工棚改造的，茅草顶、竹篾墙，但在当时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可算是豪宅了。妈妈用白纸把屋子整体裱糊一番，屋前种果树，屋后搭鸡窝。我和妹妹每人还养了一只鹅，鹅通人性，喂养熟后能认主人，能听懂命令。每天放学回家，鹅都在门口迎接，各自把主人的拖鞋叼来，并拍马屁似的扇扇翅膀。本来准备养大杀了吃肉的，现在只好作为家庭新成员，好好侍弄它们。

公路局职工们苦中取乐，组织了京剧团、话剧团、歌舞团、体育队等。每年春、秋两季举行职工运动会，每周一次文娱演出，不管山外战局如何，山内照样丝竹之声不绝于耳，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我现在还保留有35岁的父亲在运动会上夺冠的相片。叔叔是京剧的粉丝、票友，他自己参加职

工京剧团后又拉哥哥“下水”，接着把我和妹妹也拖了进去。开始时跑跑龙套，后来一板一眼地学唱几句，最后哥哥竟能挂牌独挑唱全本的《豆汁记》（又名《捧打薄情郎》），饰男主角。我和妹妹也学会了三五出戏。

我喜欢的角儿是黑旋风李逵，腰插双斧，疾恶如仇，唱念做打，铿锵有力。有一次，我在演唱会上唱“……我把忠义堂来闯”，由于发音不准，观众误听为“……我把冬米糖来尝”。从此，落了个“冬米糖”的外号。

眼看抗日战争局势逐步好转，敌人由进攻转为防御。一天，从没有遭受过敌机轰炸的银坑，突然响起空袭警报，天边出现一群黑点，并迅速变大，看样子足有几十架之多，飞机气势汹汹地向我们俯冲过来，大家急忙四处找掩蔽处躲藏，妈妈双手牵着我 and 妹妹向后山狂奔。

这一带地形我很熟悉。我对妈妈说：“前面小桥下面有条深沟，躲空袭特别好，平时我们玩捉迷藏，躲几个人两三步以外都发现不了，更何况从飞机上看。”

我把妈妈带到小桥上，指着桥面下一个可站几个人的小陡坎。这是山区用几根圆木搭在溪涧两岸的简易桥，桥两侧没有桥栏。江南潮湿多雨，溪涧两岸与桥两侧都长满了一人高的杂草，妈妈很难看清我指的掩体。

“在哪儿呀？”妈妈问。

“你仔细看，就在这儿！”

为了把这秘密掩体向妈妈介绍得清楚些，我一边拨开杂草，一边向前迈了一步。就在那一瞬，我脚一滑，跌下了深渊。可能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妹妹来不及反应，没喊也没哭。妈妈则平静地问：“敏敏，别捉迷藏了，你快给我出来！”

我头朝下倒栽葱式飞下深渊的过程中，不知怎么又被两壁的树藤拨正了，沟底到处布满尖石和深潭，而我却不偏不倚地一屁股坐在浅水下的一块平滑大石板上。过了好一会儿，远处传来了妈妈焦急的呼喊声与妹妹的痛哭声。

“妈妈，我掉落到沟底啦！”

“你好好摸摸摔伤什么地方没有？”妈妈着急地问。

我站起来弯弯腰、踢踢腿，左看右看，除了下落时被树藤划破一点皮外，哪儿都没问题，只是踢腿时发现少了一只鞋。

妈妈听我汇报后大喜，躲空袭也顾不上了，先回家去扛晒衣服用的长竹竿。邻居听说我掉下了深渊，也帮忙扛来许多竹竿、绳索，据妈妈回忆，接了六根长竹竿才刚够到底。但仅用竹竿、绳索很难将我从如此深的沟底救出。最后，按照当地砍柴的老表的建议，逆着溪涧向上游走了好几里路，找到溪壁较低处才脱离险境。七十年后，我重返故地，“竹林村”与公路局办公室都已荡然无存，在原址上建立了一个乡村医院与一所中学。但我幸运地找到了那条狭窄而陡峻的溪涧，它是赣江的一条支流，季节性向赣江补充水源。由于溪涧主要流经垂直节理发育的红色砂岩地区，因此溪涧两壁几乎直立，深度可达30米，沟底怪石嶙峋，由沟底向上看只见一线天。看到如此地形、地貌，我着实为当年的险情吓出一身冷汗。堕入此沟还能平安逃生，确是奇迹。



抗战时期在银坑的江西省公路局职工宿舍“竹林村”
今天成了银坑中学的校址

5. 人生第五劫——朱溪堡患怪病

可能是日寇垂死挣扎，平静了多时的战火又重新燃起。半年前害得我身堕深渊的轰炸，后来证实，日寇当时的攻击目标主要是蒋经国坐镇的赣

州，银坑仅仅是路过。

轰炸赣州可能是一个信号。从此，日军疯狂反扑，企图从南昌南下沿赣江打通吉安、赣州一线，战火逐步逼近世外桃源——银坑。为了以防万一，1944年春公路局组织一批车辆把职工与家属陆续疏散到一个更偏僻隐蔽的地方躲避。

这地方叫朱溪堡，是广昌县境内的一个小村庄。据说领导考虑到那里有个多年废弃的军用机场，可以利用机场的一些旧房屋供职工们暂时居住。但到现场后发现这些废弃房屋多数房梁、门窗已被老表们扒光，几乎只剩下地基了。

我们到达朱溪堡后，稍为像样的房屋已被先行者瓜分一空，连附近老表们的茅屋也都挤得满满的，凡能插足的地方，譬如堆柴、养猪的草棚都难以租到，我们只好准备在大树下露宿过夜了。

傍晚时分，爸爸兴冲冲地通知我们，凑巧找到了一间特别理想的房间。我们进屋一看，是当地十分罕见的砖墙瓦顶房，大家暗暗庆幸，奇怪先行者们的疏忽。

自从住进这间房屋后，怪事频频发生：先是妈妈感到不适；接着头天还好好的房东太太，第二天突然精神失常，疯疯癫癫；再后来，一向身体很好的我突发高烧，昏迷不醒。关于这段历史，爸爸日记中有详细描述：

敏儿终日昏睡，口中还念念有词，一到晚上更令人毛骨悚然。刚开始他说：“爸爸妈妈！我们别住这间房，我害怕！”

我们不断地安慰他，说爸妈都在他身边，没什么可怕的。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大叫：“不好了，又来了！”

我们说：“半夜了，什么人也没有。”

敏儿仰起了头，用手指着门后堆行李处。说：“你们看，躲在行李后面，绣花鞋还露在外面呢！”

再过一会儿，敏儿满脸惊恐地呼喊：“爸爸妈妈救救我！她一定要拉

我走。”

我们问：“谁要拉你走？”

敏儿答：“就是这个穿绣花鞋的讨厌女人。”就这样，折腾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我找到同事们要了些退烧、感冒之类药给敏儿服下，但毫无起色。当天夜里病情更加严重，发烧到 41℃，呼吸急促，人已虚脱。在此荒山野岭，到最近的医院也要走一天的路程。

大家都说：“这孩子很难熬过今夜了。”

更令人恐怖的是他的胡言乱语：“爸爸，妈妈，她更凶了，把土往我身上埋，我的脚已不能动了，快救救我！土快埋到我胸上了……”

这时，当地一位年长善良的老表悄悄告诉我们，我们租的那间房子几天前吊死过一个年轻女子。她上吊时的确穿了一双绣花鞋，上吊地点就在门后堆行李的地方，你们孩子肯定是被鬼缠上了。

我们夫妻俩平生从不迷信，一辈子从不敬神拜鬼，但此时却被吓得魂不附体、汗毛耸立，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向他请教救孩子的办法。

老表说：“今晚能否安全度过，要看他本人的造化。假若孩子能熬过今夜，明天白天等太阳起来，把孩子从头到脚用被头包严实，迅速撤离，跑得越远越好，此屋再也别回来，太阳光下鬼不敢跟随，跑远了她找不到，就可以摆脱她的纠缠。”

孩子已经奄奄一息，医院又远，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老表的建议不妨一试，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吧！

第二天太阳十分明朗，按照老表的吩咐我扛着严密包裹着的敏儿，竞华牵着元元（妹妹小名）飞奔逃出凶宅。

果然，几天后敏儿逐渐退烧康复，不医自愈。此事是我一辈子最大的不解之谜团。

发烧说胡话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说得如此详细具体，与后来老乡介绍的隐情完全一致，对这一切我们事先谁也不可能知道。

几天后，接到局机关传来的通知：“危险形势已缓解，可以返回。”我们很快又返回银坑，朱溪堡给我们留下一个可怕的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6. 人生第六劫——衡阳车轮下逃生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铁路系统急需一批工程技术人员，拟从公路系统调入。江西省公路局总工程师亲自挑选了一批技术骨干，其中包括我爸爸，将他们集体调往粤汉铁路局工作。

调动工作涉及两个部门，手续烦琐，相互扯皮了一两年。利用这空隙时间，妈妈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回家探望三家老人：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与过房阿爷、阿娘。

全面抗日战争前，三家共六位老人，现在只剩下三位，祖父、外婆与过房阿娘都已作古。我们从江西黄金埠渡口租了一条小船，溯信江而上，到达江西玉山县；随后登岸翻了一天山路，到达浙江常山港；再租一条小船沿衢江、兰江、富春江顺流而下直奔杭州。爸爸妈妈选择这条路线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不仅非常舒服、便宜，而且故地重游，可以回忆许多往事，顺便去看望了不少朋友。

1946年秋，我们回到故乡奉化，哥哥考上溪口武陵中学，我与妹妹考上奉化城内的文聚堂小学。不久，收到爸爸来信，他已正式调入粤汉铁路，希望我们到湖南衡阳与他会合。

1948年春，全家又在湖南衡阳团聚，兄妹们分别考入扶轮中、小学（现称铁路中、小学）。粤汉铁路管理局当时设在衡阳郊区一个叫苗圃的地方。地处湘江右岸，与衡阳城有一江之隔，交通十分不便。

为了方便职工进城、上班、上学，铁路局专修了一条小铁路从苗圃直通火车站与渡口。铁路职工家属可免费乘坐。这对于从小认为坐火车是豪华级享受的我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除上学、放学乘坐两趟外，平日一有空就泡在车厢里兜风。

久而久之，结识了一批“车油子”，他们大部分是辍学青年，聚集在车

上吃喝，或利用火车倒腾些货物，做个小买卖。他们个个艺高胆大、身怀绝技，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上跳下如履平地。这门技术对于我来说十分实用，因为铁路原本擦学校围墙通过，而车站偏偏设在离校门较远处，假若当火车经过学校围墙时直接从飞驰的列车跳下翻墙入校，比火车到站停稳后走大门入校可以节省 20 分钟时间。经过刻苦练习我成了跳车能手。

有一天，这帮“车油子”发起一场扒车技术比赛，并邀请我参加。刚开始是比从行进的列车上用各种姿势跳上、跳下，这种小儿科技术难比出高低。于是进一步提出比赛“顺跳”与“反跳”技术。所谓“顺跳”就是背对火车行驶方向，由一个车厢顶上跳到另一车厢顶上。车厢顶上呈弧形，有时被露水打湿，滑溜溜地很难站稳，技术难度很高。所谓“反跳”就是面对火车行驶方向，由一个车厢顶跳到另一车厢顶，由于惯性作用，难度更大。我就是在“反跳”时出的事，差点儿丢了性命。

“反跳”比赛开始，先由老手们带头跳，人腾空后火车还顺着跳跃方向行进，因此必须跳得更远些，才能弥补火车行驶所造成的距离损失。我看见老手们“反跳”个个成功，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一边助跑一边喊：“瞧我的！”

边上一个大哥哥拉了我一把说：“这很危险，你就别跳吧！”

话音未落，我的身体已飞了出去，身体腾空前被他抓了一把失去平衡，没能跳到对面车厢顶部，从两节车厢的接合部摔了下去，当时的小火车不像现代火车都用詹天佑挂钩连接，上面封得很严实，那时仅采用接钩加铁链，上面裸露足有一米宽的空隙。我摔到车厢接合部后直接出溜到车轮底下，身体碰到了枕木。

我记得当时头脑非常清醒，迅速闪过一个念头：小火车底盘很低，我唯一的求生机会是尽量紧贴着枕木，平卧不动。火车轰隆轰隆从头上碾过，灰尘、炉灰撒了我一脸一身，我坚持紧贴枕木一动不动。火车从我身上驶过后，哥儿们纷纷跳车把我扶起，见我并无大碍，仅腰部受点挫伤不能直立，个个都又惊又喜。但一周后即将举行衡阳全市中、小学演讲比赛，我担心腰伤会影响我参赛。正好一个哥们的父亲是当地著名的中医，擅长正

骨、按摩、针灸，他给我免费治疗了几次后，腰伤基本恢复。一周后我走上讲台，荣获中年级第一名。

这是我一生中的第六次劫难。

躲过这次劫难以后，整整 28 年平安无事地度过中学时代、大学时代及 16 年的创业阶段。一直到 1976 年我才遭遇第七次劫难，在唐山余震中被活埋。又隔 30 年，到 2006 年由于参与了唐山大地震真相的辩论，被媒体轮番围攻后，突发脑出血，遭遇第八次劫难。后两次劫难都与唐山大地震有关，证明了唐山这次地震确实主宰着我的命运。这些将在后面详述。

三、感恩北京四中

1. 妈妈启动三兄妹竞争模式

1950 年初，父亲因抢修被国民党撤退时严重破坏的粤汉、湘桂铁路，支援解放军进军西南立了功，被评为年度全国铁路系统劳动模范。新成立的铁道部急需熟悉铁道建设、管理的技术人才，父亲被粤汉铁路军管会推荐调到铁道部工作。我们全家也随父离开广州来到北京。

过去多年免费居住在单位分配的家属宿舍里，生平第一次要自己出去租房；过去免费上铁路子弟学校（扶轮中学），现在要自己交学费。这是一笔不小的额外开支，经过反复核算，最后选中缸瓦市小酱坊胡同 6 号一个破旧不堪的小四合院南厢房租下。

此处房租虽便宜但房况很差，房顶、山墙年久失修，透风又漏雨，冬天北风畅行无阻，直吹进屋。那些年北京的冬天特别冷，一个小煤球炉为三间小平房供暖，还要烧水做饭，杯水车薪根本不顶事，屋内写作业手冻得握不住笔。妈妈每天在冰水中洗菜做饭，还要洗全家六人的衣服，不久就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

住房问题解决后，接着是孩子们的上学问题。恰好，同院住着一位三十九中的张姓老教师。一天，妈妈带我们拜访张老师，他告诉我们，北

京共有两百多所中学，分公立与私立两种，公立的教学质量较高且学费便宜，私立的质量参差不齐，学费要高好几倍。譬如附近的公立学校男四中学杂费一年才 7.5 元，而质量一般的私立学校三十九中却要 20 元。

“妈，我要考男四中！”心急的我没等张老师说完，立即向妈请命。

“你们刚从外省来京，不如先考个私立，以后争取考上个公立学校，最为稳妥。”张老师不好意思驳我。

妈妈似乎没有察觉到这些，仍不知趣地追问：“教学质量最好又最便宜的有哪几所中学？”

张老师微微一笑说：“汪太太，好学校是非常难考的！譬如男四中、师大一附中、师大女附中等。我们学校有几个尖子生想转学上男四中，我帮他们辅导了几年，结果一个也没考上。现实一些，我看你们先努力考个附近的私立学校吧……”

可能他那不屑的眼光、轻蔑的笑声激怒了我，刚迈出他的房门我就对妈妈说：“反正我决心报考男四中！”

妈妈考虑了片刻，把我们兄妹三人叫进屋，开了个床头会：“张老师的话你们都听见了，考个私立学校，妈妈不会责怪你们。但我们家的实情必须告诉你们，经济上无法供三人都上私立学校，你们能否用几个月时间努力补补课，来一个比赛。只要有一两人考上个公立学校，三人学费勉强够了，就为家庭立了大功，帮家里解决了大困难，妈妈感谢你们！”

家庭会议决定：我报考四中、哥哥报考师大一附中、妹妹报考师大女附中。为了使三兄妹都能有学上，不至于有人辍学在家，妈妈启动家庭竞争模式，大家摩拳擦掌，一起去闯关，既为自己也为家庭渡过难关去奋力拼搏。

由于我小学毕业时正逢解放战争，虽先后在衡阳扶轮中学、广州广雅中学各上过几个月的初一、初二，但没完整地上满过一个学期，按部就班地学完一门功课，按年龄与水平本计划考初二的插班生，当我得知那一年四中初二不招插班生，初三只招两名插班生时，我确实吓得并不轻，但已经向妈妈夸下海口立了军令状，事已至此没有退路可走，我只好硬着头皮破

釜沉舟报考四中初三插班生。

目标确定后，我不知从哪里来了那么大的劲儿，一连好几个月，天天背着书包、带着干粮上缸瓦市新华书店坐在地上看升学指导、对着标准答案做辅导习题，早出晚归、废寝忘食。

报考的前一天，下了整夜的瓢泼大雨，大清早我顶着雨刚走到西什库教堂门口，就发现整条街已变成一条河，流淌着混浊的黑泥汤，我只好卷起裤腿蹚着齐膝盖深的水来到四中门口，只见沿学校东墙边排了一大溜长条凳，提供给报名者排队。我自以为来得很早，但十来张长条凳早已被先来的考生及家长站满，后来者只好泡在水里排队，足有几百来米长，后来听说为了争取初三两名插班生名额报考人数竟然近两百人。

结果，幸运的苹果砸在了我头上，我与赵栩在这场残酷的竞争中胜出，被编入 51 届乙班学习。更可喜的是，经过几番周折，哥哥也终于考上师大一附中，妹妹考上师大女附中。三兄妹同时攻克北京三大顶尖名校的事迹立即引起了媒体的注意，《人民铁道报》记者以《令人羡慕的家庭》为题报道此事，甚至翻出 1948 年我们兄妹三人在湖南衡阳代表铁路子弟学校（当时叫扶轮学校）包揽全市学生演讲比赛高、中、低年级三个组的冠军的老账来证明三兄妹在北京名校夺冠并非偶然。

这次成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亲朋好友传颂的佳话，也是父母引以为傲、津津乐道了一辈子的话题。他们高兴是因为这两件事证明了我们家庭教育成功，为实现把孩子们个个培养成“为人民有用”人才的目标打下了扎实基础。比父母更兴奋的要数住在同院的三十九中张老师，四邻相告、逢人便说：“了不起，真是奇迹！真是百里挑一的学霸之家。”他像自己的学生考上男四中一样地高兴。

他对妈妈崇拜至极，称她为“当今孟母”。邻居们也纷纷来祝贺，那一段时间我们走在小酱坊胡同一带常被人们投以羡慕和赞许的目光。不少家有考生的家长千方百计到我家小院转转，有事没事找我们父母搭讪两句，采采喜庆气、沾个好运气。



妈妈被邻居称为“当代孟母”，我与妹妹胸前别上男四中、师大女附中校徽与妈妈摄于中山公园

2. 北京四中果然名不虚传

能进男四中学习是一种机遇、一种幸福，更是一种挑战。学生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精英，老师中有很多是闻名全国的特级教师。一走进四中学校门就有一股书香气迎面扑来，校园的每个角落都有此起彼伏的琅琅读书声，弥漫着浓厚的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学习的气氛。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一向闲散贪玩的我不由自主地被裹挟进入你追我赶的学知识、长本事的洪流中，想停一下脚步、喘一口气根本不可能，生活节奏明显加快。



著名的北京四中校门

当时的四中不像六七十年代那样成为高干子弟的天下，也不像后来变成各界精英学生会集的贵族式学校，我们班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城郊贫穷农民或城市平民家庭，作风朴实、勤奋进取、为人忠厚，同学们之间从不比吃比穿，比的是成绩好坏、学问高低。许多穿着寒酸但学习优秀的学生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例如一个外号叫“济公”的同学，是一个一年四季穿着露脚指头破鞋的孩子，由于人品好、学习好，大家都选他当班长。

我记得当时大部分学生都步行上学，少数同学能骑上辆破旧自行车，就神气活现，让人羡慕不已。当时，四中老大门对着西什库路，进校必须穿过西什库这条泥泞不堪的土路，两边都是煤炭、辟柴店，摇好的煤球堆在道路两侧，每逢暴雨天学生们都蹚着齐膝的污水进校，卷起裤腿光着脚听课，一旦被老师叫上黑板做习题，真是有碍斯文，与南方插秧的农民无异。但老师与同学无一讥笑者，只要答题出色，大家照样都对“泥腿子”给予热烈的称赞。

学校教师队伍更是出类拔萃，有几个闻名全国的优秀教师，教化学的刘景昆、教物理的张子锷、教语文的向锦江与教数学的周长生号称“四中四大名师”，听他们的课从来不存在“逃课”现象，只担心“蹭课”爆满。当时没有电视、收音机，同学们的唯一爱好，就是享受学习的快乐，听一堂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的讲座。

张子锷、周长生老师循循善诱，注重启发，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地将当代科学的一些基础理论、枯燥的定律讲得通俗易懂，让人听起来津津有味。

向锦江老师对博大精深的国粹充满热爱与激情，讲课时旁征博引，指点东西，一段短文他竟能绘声绘色地描绘出对祖国文化深深的眷恋之情，让学生充分领略中国文字的优美与精深，我对文学的兴趣主要归功于向老师精彩纷呈的教课。现在我还保存着几篇中学时代的习作，上面有恩师热情、精辟的批语。这几篇作文都是由他推荐作为模范文章在全校展览后，我专门索回保存的。

刘景昆老师讲“元素周期表”是一绝，同学们掰着手指数着日期，翘

首以盼那一天的到来，如同手上捏着一张人民剧场的梅兰芳戏票，兴奋至极。开课那天教室经常爆满，不但座无虚席，后排、走道甚至窗户外都挤满了“蹭课”的校内外老师与同学。

四中的操场有正规的400米跑道，这是我们引以为荣的，但其他硬件并不好，上课打游击（教室不够用，经常占用上体育课的空闲教室补缺）、吃饭摆地摊（没有食堂，在礼堂外席地而坐）、睡觉大通铺（住宿同学自带床板拼凑而成），但这种艰苦环境反而锤炼了这批青年的乐观主义精神。

如此优秀的学生群体，如此出色的老师团队，以及几十年优良的教育传统，这些元素的优势组合成了四中的校风——“勤奋、进取、严谨、朴实，为振兴中华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从此，我才真正理解父母给我们取名“为民用”的含义，将父母对我们的期望作为我自己的人生目标，四中是我人生目标的起点，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定型之处。

3. 德、智、体全面发展

四中不仅教育学生要热爱知识，努力学习，更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重视培养德、智、体、美的全才。

过去四中盛产啃书虫、书呆子，被人们称为“肺病养成所”，我来到四中时正逢国家号召青年随时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作好准备，教育部发出“要全面发展”的号召，在学校里建立党团组织、提倡“又红又专”。1951年，在同桌好友刘德贵的介绍下我光荣地加入了青年团。

学校几乎每周都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全身投入热火朝天的新中国的建设中，参加北京市统一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小到协助居委会作社会调查宣传婚姻法，到天安门广场除杂草、搬运垃圾、清理护城河淤泥，到西郊种植防风林；大到作为北京市乃至全国中学生代表出席一些国家、国际活动，展示新中国青年形象，为我们提供全面熟悉社会、了解世界，锻炼与人相处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机会。

在增强体质方面，当时北京各大专院校正试点实行“劳卫制”。劳动卫国制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提高国民体质而实行的一种制度，四中被评为在中学推广劳卫制的试点单位。学生们用追求知识的热情投入体育锻炼。学校利用当时北京市中学中十分罕见的标准400米跑道体育场的优越条件，掀起了一股跑圈的热潮。只见一个个戴着眼镜的文弱书生，汗流浹背地跑圈，把每天的跑圈数填写在教室门口的黑板上。几年以后，不但学生体质普遍提高，还出现如蓬铁权、韩庆余等一批在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乃至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多次夺冠的运动健将。随着田径水平的提高，学校其他体育项目的水平也乘势而上，1953年，当我们的篮球队击败汇文中学，足球队击败十三中双双荣获北京市中学冠军时，四中永远摘掉了“肺病养成所”的绰号。

我当时个子不高，但速度快、灵活，体育老师让我练足球踢边锋，一次在与宿敌十三中的死磕中，主力边锋受伤下场，我替补上场并踢进了一球，从此便迷上了踢足球。后来，尽管在冰天雪地的苏联，当功课压得喘不过来气的艰苦日子里，我还要隔三岔五地踢上一场足球，踢球成了一剂抗压减负的良药。

除体育活动外，我还被推选为四中舞蹈团团长，成为北京市大中院校文工团成员，每周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接受张均等国内著名艺术家们的亲自培训。由我领舞的“牧人舞”代表全国中学生向出席1953年世界青年理事会的国际友人表演，受到热烈欢迎。迄今许多同学还能回忆起当时称我“四中小舞星”的昵称。

记忆中留下最甜蜜印象、受益匪浅的还是担任了三年少先队辅导员的经历，我被团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称号，得到胡耀邦、王照华等领导的接见，并与之合影。四中有个制度，从高一班级挑选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初一新生的少先队辅导员，言传身教四中精神，我负责辅导一个比我低三年的初中班。现在手头还保留一张我为1954年初三丁班所设计的少先队活动的计划：



我与我的少先队员们在一起

本学期组织主题队日共四次

第一次，主题：“祖国在我心中”。地点，北海五龙亭。主讲，汪成民。

第二次，主题：“祖国因我而骄傲”。地点，中国作协。主讲，魏巍。

第三次，主题：“为振兴中华而学习”。地点，高士其家。主讲，高士其。

第四次，主题：“在祖国强盛之日再团聚”。地点，北海“少年之家”。由我与关存和（另一班的辅导员）自己动手编写话剧，请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少年歌舞剧团联合演出。

不久前读到曾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安永玉同志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他特别提到在一次北海五龙亭的少先队会上，听了辅导员汪成民的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后，从此树立了为祖国的外交事业奉献终身的人生目标。我完全没想到，一次小小的队会，一次普通的报告竟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四中精神”的威力，自我教育与相互教育相结合，形成一股群众性后浪推前浪、人才培养良性循环的洪流。从迈进四中校门的那一刻起，在榜样的带动下，我不自觉地卷入了“为中华兴起而奋发图强”的洪流，开始是被动地跟着走，后来是主动地与大家一起走，最后自觉地成为推动这

股洪流的一份力量，带领新生们向前走，给他们作示范。这就是四中校风的“传帮带”。

4. 不断激励超越自我

虽然在妈妈的激励下经过几个月的血拼终于考上四中，但一上课发现我与同学们的差距实在太太大，我的基础理论差、掌握知识不系统的弱点暴露无遗，第一学期我在全班三十多人中考了第二十多名，发成绩单那天我闷坐在床上一整天没吃饭，在一旁的妈妈不但没有批评我，当她仔细阅读了我的考卷后还热情地鼓励我。

“不要紧，你已经在四中站稳脚跟，取得了初步成功，继续努力下去提高的空间很大，下学期肯定会追上去的。当前的奋斗目标是一年后初升高时仍能继续留在本校上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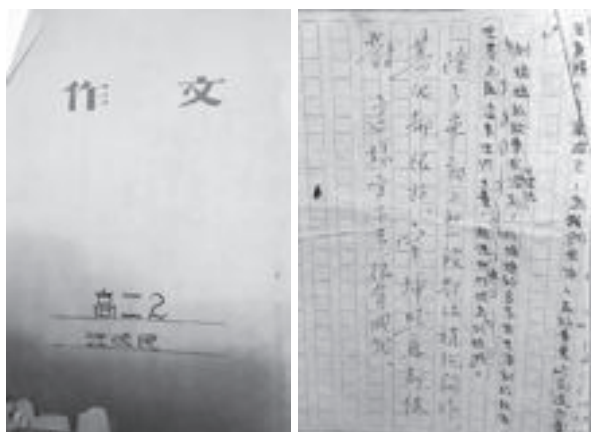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与同样是插班生的赵栩制定了一套计划，每天早晨我与他约好提前一小时到操场西北角的小树林里，把昨天的课程复习一遍，再把当天的课程预习一遍，然后学着老师的口吻相互提问答题，把这片树林变成我们提高学习能力的练功场。后来到这里来练功的同学越来越多，我与赵栩干脆从操场翻越到一墙之隔的法国坟地（今金台饭店），把幽静的古墓当考场，以大理石墓碑为课桌，为能在初升高的血拼中为自己取得一个继续留在四中学习的名额而拼搏。

当时，我住在缸瓦市小酱坊胡同，步行约 50 分钟才能到学校，而从缸瓦市坐有轨电车经平安里到校仅需 20 分钟，可是我舍不得花 2 分钱，宁可每天凌晨被闹钟叫醒睡眼惺忪地背着书包，打着纸灯笼跌跌撞撞地走到学校。

经过日复一日艰苦拼搏，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逐步显示出效果，我的学习成绩就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了，首先从语文课上找到了突破口。

一天，长得像弥勒佛似的向锦江老师笑眯眯地在课堂上说：“今天我先给大家介绍一篇你们班汪成民同学的作文，供大家赏析。”他把我的一篇

作文《我们的刘姐姐》大大夸赞了一番。经他推荐，此文作为范文贴在校门口公告栏一周，以示表扬。从此以后，我的作文成为学校范文公告栏的常客。



我的作文多次被向锦江老师推荐为范文并贴在学校光荣榜上

早已作古的向老师在“反右”“文革”中受尽磨难，今天我还珍藏着从学校范文公告栏揭下的纸质发黄的稚作，上面被向老师通篇画满红圈并写有大段赞美之词，每当看见它时心里充满感激之情，是向老师燃起了一个少年奋进的勇气与信心。对恩师坎坷的一生，我唏嘘不已。

继语文之后，我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功课也逐步追上班上的尖子生，经常受老师称赞。初中毕业考试时，我的成绩已由上学期的全班倒数十几名进入全班前几名，免考升入本校高中。

这次成功使我再次尝到了甜头，突然开窍明白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把各方面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到极致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从此以后，我学会了规划人生，不断树立每个阶段的奋斗目标，不断超越自我。

当升入四中高中的目标达到后，我又树立下另一个目标，要成为优秀团员、北京市三好学生，这个目标在高二时也顺利实现了。接着考入清华、

北大又成了我中学时代最后一个新的奋斗目标，但是 1953 年的一次偶然事件使我改变了努力方向。那一天，我像平日一样路过校长办公室前的布告栏，发现上面贴着一张鲜红色字迹未干的喜报：

“我校高三应届毕业生郭增瑞等六名优秀生被国家选拔派遣赴苏联留学……”

“妈，我不考清华、北大了！”我兴奋地跑回家，进门就喊，正在洗衣服的妈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迷茫地问：“出了什么事了？”

“今年学校从毕业班的尖子生中推荐了几人参加赴苏联留学的选拔考试，我想努力争取参加明年的留苏生的选拔！”

妈妈虽然从未听说过赴苏留学之事，也为儿子远行赴异国他乡的计划而担忧，但她仍支持我的选择。

树立了新的更高奋斗目标后，我的学习劲头更大了。当时，我们家已搬到东城区王府大街铁道部家属院居住，离学校很远，为了节省上、下学的走路时间，改善学习环境，我决定搬到学校里来住。

当时四中学生宿舍与兵营一样是大通铺，每间房里睡十几个学生，除了床以外已无插足之地，连冬天安炉子都挪不开窝。最有趣的是，学校无力提供住宿生的床铺，一切需要自备，由于来自各家的床板高矮、长短不一，只能靠垫砖挖坑来凑齐。因此，半夜一不小心发生床塌人翻的“地震”，全宿舍光着身子奋力抢修搭床的事时有发生。

尽管这样，但学习的时间充裕了，学习条件改善了，我有更多的时间往图书馆里钻。四中只有一个二十几平方米的图书馆，不说没有阅览室，连图书都摊在地上，无法上架。我说的图书馆是指文津街的老北京图书馆，离四中仅十几分钟路程，我们一向把它称为“我们的图书馆、阅览室”。我高三全年课余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一帮中学生长期占据阅览室最好的位置，久而久之，图书馆规定：禁止只带教科书复习功课的学生入座，要求必须先借阅几本馆藏书才能占座学习。感谢图书馆这一举措，逼我在复习功课的同时还博览群书，无意中培养了我兴趣广泛、爱好全面的习惯。

5. 第一次走上国际舞台

高中毕业前夕，张子锷老师建议我学理工，向锦江老师动员我报考文史，正在为报考北京大学文史还是报考清华学理工犹豫不决时，一天，温寒江校长通知我：

“高考志愿表你先不用填了，学校已经决定推荐你出国留学苏联，一周后准备参加留苏预备部的考试。”

“高考不是还有一个月吗，为什么提前考？这不是突然袭击吗？一周时间来不及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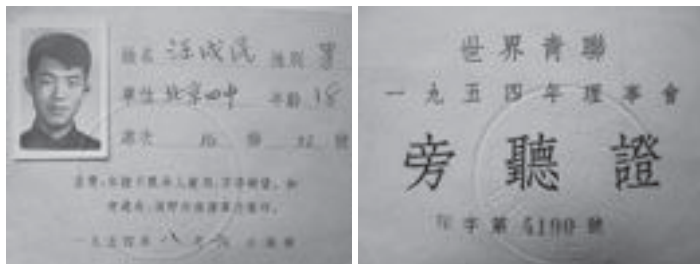
“北京市中校都是昨天得到教育部的通知，要求今天通知到本人，大家都一样只有一周时间，主要想摸一摸考生们平日的学习成绩，我相信四中的水平！”温校长笑着为我减压。

“万一留苏去不了，填报其他学校的期限也过了，怎么办？”我仍然顾虑重重。

“根据教育部规定，只要通过留苏预备部的录取分数线，而没有被选上出国留学，国内各大学都欢迎你们免试入学。”温校长答。

一周后，我匆匆参加留苏预备部的选拔考试，闲赋在家等待录取，刚从白热化拼高考的战斗中退下来，百无聊赖，闲得发慌，看着奋力拼搏的同学们，不知为何有一种莫名的当逃兵的失落感、羞耻感。

这时，校团委书记刘铁岭找我：“快进来，学校早有安排，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你去完成！”



1954年参加世界青联理事会的出席证

他拿出一份文件说，世界学联、世界青联理事会今年夏天在北京召开，为了展示中国青年的风范，团中央、全国学联要求北京市选派十名优秀中学生、十名优秀大学生作为中国学生代表列席会议，学校推荐你去已经获得上级批准，尽快抓抓外文，下周五到团中央报到。

在团中央会议厅，我熟悉的高大英俊的原少年部的江部长接见了我们，布置了任务：要求我们主动、热情与外宾多交朋友、介绍情况、活跃气氛、做好服务。会场上，我遇到好几个熟人，很多是当时北京市中学生的佼佼者，我们在北京市三好学生表彰大会上见过面。原来师大附中、男八中、师大女附中、女一中、女三中与四中一样，也都推荐了应届毕业生中选拔去留学苏联的学生来参加。其中师大女附中有个叫闻克婉的恰好是我一起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训练时的舞伴，一个北京大中院校文工团著名的舞蹈高手。

“你也来了？”

“学校选拔我去留苏，高考提前考完了！”

“我与你一样！”

江部长立即分配任务：“汪成民、闻克婉除完成指定任务外，还有负责活跃会议的气氛，会议休息时组织大家唱歌、跳舞。”

会议主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团中央给我们每个人办了一张出入中南海的大会旁听证。这是我一次走进中南海、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外国人、第一次用外语对话、第一次踏上世界舞台。开始几天有些胆怯、略显生疏，几天后陪同外宾参观四中、攀登长城时已经胆大多了，能够利用我少量词汇、不规范的发音与外宾对话了。

万事开头难，有了十八岁第一次进中南海的机缘，就有后来十几次进中南海，五次向周恩来总理，多次向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汇报的历史，就有后来几十次参加国际会议，面对数百个国家代表，在强烈灯光聚焦下仍能从容不迫地在联合国总部向世界介绍中国地震科学成就的难以忘怀的经历。

四、难忘苏联情怀

1. 鲍家街的挚友们

1954年9月，我被留苏预备部录取，到位于西单鲍家街43号俄语进修学院的留苏预备部（今中央音乐学院院址）报到，编入54届61班学习。

报到的那天，妈妈亲自做了我最爱吃的梅干菜红烧肉给我送行，吃完饭后，母子俩背着行李一起从东城王府大街徒步走到西城鲍家街，像送子参军一样把我交给国家。一路上，她反复叮嘱我不要辜负国家的培养，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她细细梳理我的优点与缺点，当时不懂事的我强忍着她的絮叨，甚至心中燃起过一丝的不快。以后几十年再没有人这样与我谈过话。可是妈妈天不假年，55岁就早逝了，那次穿城相送的情景多少次在梦里依稀浮现，让我在甜蜜中苏醒。我多么希望再一次享受这种关怀备至的絮叨！

从此，我成为四兄妹中第一个食衣住行由国家全包的人，家庭无须提供任何经费，由国家提供里里外外的穿着，由国家每月支付伙食费18元（比四中伙食费高三倍），另外，还可领三元零花钱。我成为一个自食其力者，一边读书还一边挣钱，零花钱我舍不得花，攒了一年，临出国时给妈妈买了块“上海牌”手表作为告别礼物。到今天我仍然能清晰地记得妈妈接到手表时快乐激动的表情。

我们的宿舍安置在与教室隔一条街的石驸马胡同女师大旧址的礼堂里，旁边就是从鲁迅文章中已经耳熟能详的刘和珍的纪念碑。硕大的礼堂整齐地排着由几十张上下铺的双人床拼成篮球场面积大小的通铺，像个兵营或像东安小商品市场，我生平第一次经历这种几百人住在一个大厅里的大集体生活，每天晚上热闹非凡，兴奋异常。可惜，半年以后大家恋恋不舍地搬到位于魏公村的崭新校址（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座座米黄色大楼配以古色古香的碧绿色大屋顶，显得气派豪华，四个人一间宿舍的安静与原来大礼堂集体宿舍的热闹形成强烈反差。

如果说四中集中了一批北京市精英学生的话，留苏预备部则选拔了不

少全国的精英学生，他们个个才华横溢、踌躇满志。我深深感到前面是更广阔、更艰巨的人生旅程，我再一次迈上了新的长征路，给自己提出更高的奋斗目标。今天留苏预备部的不少同学已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1954届61班三十几个同学都是来自全国各地重点学校的高才生，北京、上海、天津、成都……其中有十几个同学由于性格、脾气对路，我们特别要好，六十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共同牵着手一起变老，每个人命运的坎坷都引起大家的牵肠挂肚。

这个集体的核心是61班的五朵金花：



外语学院留苏预备班1954届61班部分同学在60年后再相聚（前排自右向左：陈兴国、邹竞、王超、周慈敖、汪成民。
后排：陈耀庭、陆懋荣、于淦、葛葆安）

来自天津的王超是大家公认的精神领袖，我们的偶像。中学时入了党，是班上少数党员之一，她虽然与我们同龄，但待人处事比我们成熟得多，但凡我们发生争论，她的意见往往是大家取得一致的定音鼓。

来自上海的周慈敖是充满阳光的才女，学习成绩拔尖，英文、俄文均优，沉重的学习压力在她身上丝毫没有痕迹，整天伴随她的不是银铃般的笑声就是动听的歌声。

来自苏州的邹竞是个才貌双全的精灵，娇小玲珑的身材，冷漠高傲的

表情，在公共场合，她习惯沉默寡言但经常一鸣惊人，只要班上出现戏弄男生的恶作剧，不用猜肯定是她或陆继贇主谋。

陆继贇像只美丽的小鹿（她姓陆），她的舞姿与学习成绩一样优秀，她身材苗条、腰身灵活，是一流的舞蹈高手，在北京大专院校文艺会演获奖节目“十大姐”中，她和王超都是主要演员。1955年夏天出国前在告别演出上，我与她在自编节目《十年后再相会》中的一段双人舞，至今许多老友还不断提起。

刘梅英身体健壮、性格直爽，是运动场的风云人物，在留苏预备部时她就担任女排队长，后来到了北大仍是北大女排主力。她来往于宿舍、教室、食堂从来不一步步好好走，又蹦又跳就像只快乐的小羚羊。

围绕在她们周围的是一批意气风发、英姿飒爽的少年，如陈兴国、陈耀庭、葛葆安、于淦、陆懋荣、李健南等，这批“发小”们成天“混”在一起学习、嬉闹，在不识世界、不明人生、不懂爱情的氛围中建筑起了世界上最纯真的友情，这在我一辈子的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深情厚谊在我后来几十年的颠沛流离、起伏坎坷的经历中，再也没有遇到过。现在，他们中间有的成了院士、有的是某些专业领域中的顶尖人才，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也有的没能躲过政治运动的旋涡，一生坎坷跌宕，满腹经纶却报国无门，才华横溢反成罪过。但老同学们无论是飞黄腾达、光彩夺目还是屡经磨难、穷途潦倒，对我来说永远是鲍家街的一群纯真、暖心、聪颖、快乐的挚友。

我经常反复思考，为什么在留苏预备部仅相处短暂一年及苏联同窗五年的同学中，许多成为一辈子无话不说、相濡以沫的挚友，其数量甚至超过以后几十年所交挚友的总和？

工作后的同事，几乎每年都经历各种政治运动与形形色色的竞争，人为地制造了大量你死我活的利害冲突，把友谊撕裂得支离破碎，身边出现大量以攫取利益作为交往唯一目的的“利友”，一有风吹草动，朋友间诬陷栽赃、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

而这批怀着共同抱负、共同理想去完成神圣的使命而聚集在一起的高素质、高智商的十七八岁的孩子，毕业后又各奔东西，开拓自己的事业，相互间没有丝毫的冲突、竞争，只有鼓励、提携，这种友谊不存在任何营私目的，相互都是可以坦诚相对、无话不说的“发小”、挚友。

2. 美丽的第聂泊尔河畔

在留苏预备部一年的俄文强化学习过关后，1955年8月的一天，由铁道部调拨的留苏生专列从前门火车站起程，直奔莫斯科雅拉斯洛夫火车站。学校通知，为了保密与安全，家长就不要送站了，由学校集中包车直接拉进月台。临行前量身、制装，最后每人发了两大箱子够穿五年的服装，两套冬装、两套夏装、帽子、鞋子、毛衣、毛裤、衬衫、背心一应俱全，由于发的箱子、衣服一模一样，拎进宿舍开箱检查就混成一团、你我难辨了，我们只好给箱子贴上标签、衣服口袋塞上字条，折腾了一晚。

上午十时，终于来了几十辆大轿车，学校直接把我们送进月台，月台上挤满了送行的家长。

“不是说保密，不让家长送吗？我都没敢通知我妈！”“傻瓜，你太老实，满月台的高干，对他们能保得了密吗？”

车到满洲里，教育部代表跟车送到边境，把我们交给前来迎接的驻苏大使馆的代表——李滔参赞，在满洲里车站举行了告别宴会，每个桌子端上两个大脸盆，里面是盛得满满的牛羊肉，领导们举杯祝大家身体健康、学业有成，酒足饭饱后，专列缓缓通过国境线到达奥得堡（今外贝加尔茨克）。从此，窗外满是一望无际、绵延不尽的森林和原野，一天见不到几个居民点。

车到贝加尔湖，列车绕湖畔整整走了一天，我正倚窗观湖景，扩音器传来留学生专列广播站的通知：“曾经向中国高教部申报填写了志愿书的同学请注意，经过苏联高教部批准，现公布第一批学员名单，凡听到名字的请到餐车领取入学通知书。”从车厢的广播中，我知道了我被分配在乌克兰第聂泊尔彼得洛夫斯克矿业学院地质系学习。

记得留苏预备班快结束时，班长让大家填了个志愿表，可以选择苏联任何学校、任何专业。我兴趣广泛，正不知如何下笔时，在一旁的李健南怂恿说：

“你身体好，又爱游山玩水就填地质吧！”

“行，我听你的，就填报地质勘探系。是那高山的风，吹动了我们的旗帜……”我哼了一句当时流行的勘探队员之歌。

谁知这个我误以为仅仅是志愿摸底，不经意填写的表格竟作为正式外交照会通知苏联并获得批准。

经过八天九夜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达莫斯科雅拉斯洛夫火车站，使馆已给我买好第二天去南方乌克兰第聂泊尔彼得洛夫斯克的火车票。又乘了一天一夜的火车，1955年8月21日，我到达学校办好入校注册手续，9月1日就与苏联同学混编班组正式上课了。



留学苏联时期的证件照

第聂泊尔河流域由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是斯拉夫民族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欧洲多种民族反复纷争攻占的领土。第聂泊尔彼得洛夫斯克是苏联南方的一个大工业城市，人口约三百万，冶金、煤炭、机械业很发达，是苏联航天、航空及军事科研的重要中心，被苏联政府列为最保密城市